

海外人士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全世界非暴力运动合作者共同遵守的信念

赵然诺 译



CHINA RIGHTS IN ACTION

海外人士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全世界非暴力运动合作者共同遵守的信念

赵然诺 译



CHINA RIGHTS IN ACTION

中国权利在行动

目录

序言

如何阅读这本手册

一、普通人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
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情愿
参加全球请愿
使用照片请愿
使用社交媒体
使用推特替代品
网上捐赠或者短信捐赠
公布名单和羞辱独裁者
翻译
写专栏
撤消名誉学位
建立非暴力运动网站
HTTPS 加密邮件
PGP 加密邮件
恶作剧
在重要地点进行非暴力抗议
全球绝食
参加国际非暴力维护和平运动

二、NGO、基金会和其他民间组织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小额资助计划
大额资助计划
信贷证券 (hundi/ hawala)
物质援助
能源援助
网络资源
培训活动家

培训反对党成员
培训独立媒体
培训地方选举监督员
培训警察和军队
培训法官、检察官和公益律师
培训活动家
民意测验
选举监督
拍摄非暴力抵抗活动
制作非暴力抵抗电子游戏
召集名人声援
开演唱会和发起公共事件
说服宗教领袖
对于非暴力抵抗运动进行嘉奖
大学捐赠教学设施和教育资源
奖励叛逃者
建立独裁者名录
讨论最优方案
建立线上信息交换平台
召开年度会议
及时回复活动家的咨询
建立年轻活动家网络
为活动家提供奖学金
建立推特论坛
绘制支持者地图
揭露独裁者
制作非暴力抵抗问答手册
建立国际规范标准
施加国际压力
国际商务透明化
外国记者
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教育
召开国际视频会议
现场直播
激光
证据收集和记录保存
绘制危机地图
自由无人机和空中监视
卫星

三、科技人员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举报人维基
非暴力共同体 App

网络镜像
开源技术
全球代理云
多跳网络
分享额外带宽
制作网络防御手册
制作数字人权事件日历
制作电子防御网
“洪水攻击”防御保险
洪水攻击
电脑病毒
阻断通讯

四、艺术家、记者和传媒专家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涂鸦
动物信使
非传统信息传递
地下网络
用颜色标注公共空间
灯光信号
信息图像化
抵抗艺术
破坏广告
大型户外广告牌
海报和贴纸
现场直播抗议活动
恶作剧
证据收集和记录保持
扩音器
用玩具和体育器材恶搞
手机
传真机
蓝牙
拨号调制解调器
双向无线电
单兵电台
AM/FM 广播电台
小功率可调频电台（LPMF）
手持高频/超高频电台（VHF/UHF）
国际电台
卫星网络解调器
卫星手机
加密数字速记

五、外交官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发表声明与行动

提出建议

召集活动家会议

帮助活动家与外国政府取得联系

监督审判

抗议

外交豁免权

给活动家提供庇护

加入抵抗活动

六、外国政府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对外国服务公司，军队和公务员进行教育

附加援助条件

公司

避税天堂

国际商务透明化

军事援助

出口许可证

发展援助

给邻国施压

取消双重国籍身份

黄金降落伞

在邻国建立广播站

移动电话“影子网络”

有条件伙伴关系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查明事实和联合国维和

罗马法条约体系

国际特别法庭

国际刑事法庭

国际逮捕令

拒绝外交豁免权

外交制裁

禁止出游

体育制裁

武器禁运

科技制裁

航空制裁

明智的经济制裁

冻结资产

公司制裁
条件制裁
恶债

七、企业和消费者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不去独裁、专制国家旅游
抵制独裁、专制国家的公司
白名单
国际商务透明化
国际视频会议
企业施压
给邻国施压

附录：干涉的注意事项

序言

不论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有不民主的国家，就有民主运动。在这些运动生生不息蓬勃发展之时，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民主勇士。

很长时间以来，民主运动一直被看做是政府和基金会支持的领域。而政府和基金会执行的政策往往收效甚微。公众对政府在此问题上的表现总结为三种情况：隔岸观火，经济制裁、军事干涉。而普通民众几乎没有任何知识和渠道去支持那些在遥远的国家进行抵抗的民主勇士。本文希望能为人们解惑答疑。

在微博、搜索引擎和支付宝的时代，要支持一场外国的民主运动变得十分简单。有许多证据显示，对于民主运动的支持只需要我们点一下鼠标，捐一点款，或者发一条微博。同时，这些非暴力的方式还可能给政府支持国际民主运动带来革命性变革。

但即使所有这些手段都摆在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面前，人们仍然对自己如何支持那些境外的民主运动一无所知。本文试图改变这一状况。

后面的所有章节都旨在发起一场支持或不支持全球民主运动的讨论。我们将介绍 120 种非暴力抵抗工具和战术。这些工具和战术适用于全球的政府、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公司、IT 精英和一般民众。

有些方法已被反复证明是可行的，有些则从未被付诸实践。一些手段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而另一些则会带来无穷的福祉。本文的作者还没有自负到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手段最为有效。相反，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给那些身处极权国家之外的人们提供一些技术和方法，使他们能够与那些民主勇士一起对抗独裁。

毫无疑问，这份清单不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些战术仍然会被遗漏，还有一些会被忽略。因为如此，本文将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手册”。列举这份清单的目的不是对支持非暴力运动的方式进行总结，仅仅是抛砖引玉。我们欢迎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各种对于海外人士如何支持反对独裁的非暴力行动方法的重新诠释。

**本文的作者不提倡任何非法的和危险的活动。参与这些活动的读者——即使这些活动包含于本文之中——必须自己承担风险。*

如何阅读本手册

这本手册是在纽约举办的一个工作坊的成果展示。这一为期两天的工作坊，有超过 12 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活动家、学者、捐款人和捐助事业从业者参加。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是重新定义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那些有能力有意愿在海外支持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们可以更方便的参与其中。不管这些手段多么有争议或者多么不切实际，只要这些手段有可能给直接对抗独裁者的活动家提供帮助就值得一试。他们的目的不是提供某些特殊的方法或途径支持民主运动，而是希望人们从中得到启发，以创造出更多新的支援反独裁的非暴力运动的方法。

多年以来，学者和活动家们考虑过各种各样的外部干涉的优势和劣势。在讨论海外是不是应该使用，以及怎样使用这些工具和方法时，还应该考虑以下情况。

当地文化：所有的外部干涉都应该谨慎而周密的考虑当地特定的环境。所有的战略战术都应该基于问题所在国的国情和文化。当然，没有两个国家完全一样，因此处理这些国家问题的战略也不会完全一样。

同意：对于海外人士而言，本手册提供了一份可使用手段的清单。当然，最具决定意义的是那些独裁、专制国家内的活动家，他们才是如何使用这些手段的决定者。外部干预应该考虑那些活动家的愿望，他们关注的问题和他们所受到的条件限制。外部干预必须取得国内活动家的同意才能投入到这些运动中去，而且必须确保他们的努力能够满足国内活动家的特定需求。

风险和回报：外部干预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盲点。所有的干预都有风险和回报。不管你选择什么手段，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取舍。为了最小化不必要的连带破坏，外部干预者必须清楚这些取舍，并且充分考虑对国内活动家可能产生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长期和短期效果。

核心价值：最终，所有的外部干预都必须符合那些干预者和活动家共同持有的核心价值。在进行干预问题时，这意味着外部干预和国内的活动家之间必须保持一写程度的透明度。这些决策的制定必须合理且可靠。只要有可能，干涉必须平等和包容。在国内的活动家开始行动之前，外部干预者必须考虑他们自己如何在国外付诸行动。

类型学：这份清单是根据行动者的类型而分类的。便于政府使用的手段和便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使用的手段是分开的。这些手段根据干预的复杂程度进行排列：越简单的排在越前面，越复杂的排在越后面。这种区分可以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操作。不同人群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是用不同的手段，我们解释了这些手段可能的双重作用（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手段的办法。

普通人——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正当中东和北非的活动家在抗议独裁者的时候，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思考怎样才能帮助他们。不管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人们都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终结远方的专制。下面我们将介绍其中几种方法。

发电子邮件和打电话：给所在选区的议员发大量的邮件，是一个表达意见的快速而廉价的方法。在涉及具体的立法信息时，打电话非常有效。打电话和发邮件的行动如果被精心策划再和其他倡导行为搭配起来使用，将产生巨大的效应。在美国，美国审查机构网为公民们如何联系国会议员和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手把手的指导。

国内请愿：请愿是另一种廉价向那些支持外国强权政府的议员们表达不满和施压的方式。特别是网上请愿，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方式。但是像打电话一样，这些请愿活动必须精心组织而且必须和其他公民抗议活动组合起来才会有效。

全球请愿：请愿行动也可以用于表达对强权政府的国际性抗议。不管你身处何地，都可以向全球的支持者征集签名，而且经常可以把矛头指向超国家机构。比如 2011 年春，“匿名国际”收集了 16 万 5 千 9 百多个签名，支持国际刑事法庭托管叙利亚的主张。尽管成本非常低，但很多人认为这种请愿在促进变革方面的效率也很低，但却经常给人成功的假象。

照片请愿：另一个使抵抗运动脱颖而出的网络行动是照片请愿。照片请愿要求参与者集体行动，提供他们的视觉图像，借以表达对某个政策的不满或者支持某个观点。比如 350.org 使用照片请愿倡导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些图片都可以变成非暴力运动抵抗和团结的有力标志。因为照片为依赖言语，而且非常容易让跨文化的人了解他们的主张。但是正如传统请愿一样，照片请愿必须要在战略方面高度组织化，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社交媒体：很多人都宣称，社交媒体在中东和北非的“革命浪潮”中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但是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证据显示，如果网络是通畅的，社交媒体，比如脸书和推特确实可以扮演国际支持者和国内活动家之间沟通的便利渠道。社交媒体既廉价又有效，在埃及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伊朗 2009 年的大革命被冠以“推特革命”，就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的作用。不过，也正因为社交媒体在推动革命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它也被经常指责为政治化网络。社交媒体也经常被当局所关注，所以很可能也会变成被当局利用的工具。比如叙利亚政府获得了很多反政府抗议者的网络信息后，很多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分子和大 V 们被逮捕受尽折磨。但无论如何，社交媒体作为海外人士支持国内民主运动的手段却是非常安全有效的。推特和脸书可以把独裁者的丑陋嘴脸和民主斗士的光辉一并展示出来。

推特的替代品：为了让生活在网络封锁的国家的人民也能使用推特，谷歌和推特联合推出了一个替代产品“连接推特”（SpeakToTweet），用户可以用电话语音留言的方式使用推特。后来谷歌削减了这个项目。于是“小型世界新闻”网站设立了一个版块“埃及现场”，用来

发布一系列推特语音留言的译文。“埃及现场”本来的目的是帮助埃及的活动家绕过网络封锁，当埃及网络被政府切断后，它成为要求“连接推特”继续运行的平台。

网上捐赠和短信捐赠：网上捐赠经常被用来为地方反对派的活动提供资金。就在最近，网上捐助帮助反对派购买卫星设备运往中东和北非。“买卫星(Buy This Satellite)”项目是一个非营利的网络项目，该项目集资的目的是购买一个空闲的通信卫星为非洲提供互联网接入。从1200个小额捐款人那里筹集到了差不多6万5千美元。网上捐赠集资的特点是速度快，目的性强——特别是为人道主义援助集资。网上捐赠的核心问题是资金使用必须透明。同样重要的是，要制定一个快速而有效率的使用这些资金的计划。

公布名单和羞辱独裁者：人们还可以公布那些支持独裁当局的政府、公司和个人的名单，来提升社会对人权侵害的意识。公布名单和羞辱战术经常被用来对付那些为独裁当局提供资金、武器、后勤的国家和组织。通过公布和人权侵害者沆瀣一气的名单，可以迫使这些组织撤回对独裁者的支持。很多非政府组织都在这条战线上行动，比如“缅甸运动-不列颠”，他们列出给缅甸将军提供保险的公司名单，号召英国公民抵制这些公司。这一策略同样适用于亚洲那些雇佣童工的血汗工厂，以制止耐克、GAP这样的跨国服装公司与他们合作。和其他非暴力抵抗手段一样，公布名单进行羞辱可以成为削弱当局支柱的有效工具。但是，它必须经过战略性的组织，并且与其他工具组合起来合理使用才会有效。

*这一方法NGO同样可以使用。

翻译：关于非暴力技巧的著作很多，大到吉恩·夏普博士的鸿篇巨制，小到如何简易处理催泪弹。但是这些著作往往由英语写成，因为语言不通，各国活动家很难读到。对于母语是俄语、缅甸语、韩语、闪族语的人来说，翻译可以把这些有用的信息送到他们手上。”全球仿声计划”(GlobalVoice Lingua Project)就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施展他们语言才华的地方。

专栏：海外人士还可以通过写专栏来支持国内的非暴力运动。发表在主流杂志或报纸上(比如纽约时报、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可以让普通公众关注那些鲜为人知的人权侵害事件。外国通讯记者也可以考虑发表国内活动家的文章。

撤销名誉学位：在独裁者任职期间，他或者他的家庭成员有时会从一些学术机构获得荣誉学位。为了抗议这些独裁者，这些学术机构可以考虑撤销这些学位。如果学术机构不这么做，其他人可以向这些学校机构压力，比如采用非暴力抵抗手段。

非暴力抵抗网站：网站既可以为非暴力战略行动提供必要的手段和路径，又可以让国际社会与国内的活动家建立密切的联系。比如在“阿拉伯之春”期间，www.accessnow.org为活动家提供翻墙信息。www.avaaz.org为活动家提供播放当局实施暴行视频的平台。Youtube和其他网站把这些视频推送到头条，向全世界揭露埃及人、叙利亚人、也门人受到的人权侵害。

HTTPS 加密邮件：活动家需要一种简单的技术，可以让他们不必担心交流信息被拦截。其中一个交流方式就是加密邮件。加密技术可以使邮件内容不被收件人以外的任何人看到。有很多种邮件的加密方式，很多大型的免费邮件服务公司提供类似的服务。比如Gmail就被默认HTTP加密，Hotmail用户可以选择其邮件是否加密。但雅虎就没有提供加密选项——这意味着通过雅虎邮箱联络的活动家很容易受到黑客攻击。不过，HTTP加密使邮件在收件人和服务器之间是安全的，但是如果邮件发送到非HTTP加密邮箱就有可能被解密。一个更加安全

的邮件交流方式是 PGP 或称秘钥加密，这种方式可以在邮件发送前进行加密。

PGP 加密邮件：PGP 加密邮件比 HTTP 加密邮件更加安全。通过发放公共秘钥或私人秘钥（密码）可以确保只有特定的收件人才能读到 PGP 邮件。PGP 加密可以使用任何邮箱——Gmail、Yahoo、Hotmail 或者任何其他服务商，这是一个确保邮件安全的绝佳方式。但是公开秘钥的缺点是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依赖加密服务的邮件使用者经常会和活动家一样被当局盯上，而且还会在某些禁止加密的国家面临刑事指控（比如巴基斯坦）。

恶作剧：恶作剧电话或者恶作剧会议也是普通人可以嘲讽独裁者的方式。比如在米洛舍维奇统治时期，塞尔维亚的活动家会定期组织恶作剧，来对付那些忠于国家的警察和其他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相信幽默可以战胜恐惧。恶作剧也越来越多地被外国人采用来贬低独裁者。比如在 2003 年，两个美国电台主播假装成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给委内瑞拉独裁者查韦斯打电话。“离散犹太人”组织的成员和其他人也会和当局搞恶作剧。比如与当局就一个会议的时间、地点达成协议，反对派趁机在另一个地点准备抗议活动。恶作剧也经常被国内的活动家当做非暴力抵抗的重要工具来使用。不过海外人士使用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有人甚至建议组织全球“作弄独裁者”日，打爆独裁者政府成员和他们忠实走狗的电话。当然，使用这一手段必须慎之又慎，以防我方线人或活动家遭到报复。

在重要地点进行非暴力抗议：普通人可以在独裁者出访你所在的国家的时候，在重要地点组织大型静坐或者抗议活动。这些重要地点包括机场、宾馆、联合国大楼，人们可以在那里表达他们对人权侵害行为和反民主政策的抗议。但是，想要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些行为必须精心策划，并且与其他非暴力抵抗战略行动配合进行。

全球绝食：这也是非暴力抵抗常用的方式。全球绝食，即不同国家的人在同一时间进行绝食。2011 年 7 月，在非洲的达尔富尔“生命在流逝”组织了一个全球 1 万人参加的绝食行动。每一个参与者都为达尔富尔受暴力侵害者隔离绝食 24 小时。绝食必须非常谨慎，而且要有医疗专家协助。全球绝食能够吸引媒体的高度注意，如果它有一个明确的、可执行的目标，并且作为一个更大的非暴力抵抗战略的一部分时，绝食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

参加国际非暴力维护和平运动：人们还可以考虑加入一个多国维和团体来对抗暴力。“调解使团”（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通过“哥伦比亚和平存在计划”派遣志愿者到哥伦比亚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已经有将近 10 年了。这些志愿者帮助当地社区成员躲避民兵的追捕，协助他们获得食物并安全的回到家中。其他协助组织包括：国际和平旅、非暴力和平军、基督教调解团。为什么不把这些努力扩展到独裁者残酷统治的国度呢？那些美洲、欧洲、亚洲和世界任何角落致力于推动民主运动的人们可以通过接受非暴力协助训练，直接到现场去帮助当地的活动家。这个工具必须在当地活动家的要求下进行。由于很多地方的特殊局势，维和团体很可能给行动中的当地活动家和来支援的协助者同时带来危险。这个工具也可能被独裁者污蔑为活动家里通外国和出卖国家的证据。

NGO、基金会和其他非民间组织——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数十年来，非政府组织一直致力于协助活动家在不民主的国家争取民主。在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制裁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时候，被 NGO、基金会、大学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提出的非暴力政策却少有人问津。这一章的是试图对这些方法做一个总的概述，目的是让非政府组织更了解这些手段和工具，用以协助活动家削弱独裁者的权威，而不必诉诸暴力。

小额资助计划：小额资助计划可以资助政党、持同情立场的地方政府、军队成员、NGO、公民组织、商团和媒体。在外国银行账号被冻结的国家，这些资金可以通过外国人用手提箱、汽车夹带进这个国家。在塞尔维亚，这类小额资助计划被证明意义非凡。反米洛舍维奇的学生组织“抵抗”（Otpor）接受了这类小额资助，用于购买传真机、电脑和其他诸如 T 恤、徽章、贴纸和小手册一类的东西。小额资助流通快、手续简单。和接受大额资助相比，几乎没有繁琐的官僚手续。但是，和其他所有干涉形式一样，小额资助计划也会给当局指责抵抗团体是“美分党”、“外国间谍”的借口。（塞尔维亚政府对于“抵抗”（Otpor）组织的指责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特别是在推翻米洛舍维奇之后，该项目成了瓦解“抵抗”（Otpor）的导火索。）

大额资助计划：政府和国际 NGO 可能会把大额资助款转给国内的独立媒体、公民团体、工会等组织，以支持其长期项目。比起小额项目，大额项目的优势在于更持久，可以支持更大型的计划。但是申请这类项目需要很长的周期，有繁琐的审批程序。更重要的是，这一类资金经常需要透明化，很容易暴露外国资金与抵抗运动之间的关系。

信贷证券（Hawala）：捐款是外国人为国内活动家提供资金对抗极权的重要方式，但如何把资金汇给国内的活动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信贷证券是一种存在于传统银行系统外的汇款方式。它依靠全球非正式信贷证券网络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同意在非正式情况下借贷资金，这种方式使资金很难被追踪。信贷证券是在中东、非洲和亚洲广泛使用的资金流转方式。这种方式使“离散犹太人”组织的成员可以把资金送给他们的家人。

信贷证券同样也可以被海外人士用来进行人权救助和为抵抗运动提供应急资金，特别是在那些缺乏正常有效筹款渠道的地方。比如在阿富汗，信贷证券已经成为人道援助、大多数 NGO 和国际资助方的主要资金传输方式。NGO 通过这一非正式渠道已获得了超过 2 亿美元的资助，其中私人捐款增加了 1 百万美元。分析家称，和正在运行的官方资金渠道相比，阿富汗信贷证券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有效的、廉价的国际-国内支付工具。

在汇率管制或者银行系统管制的国家，信贷证券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资金转移手段。但它也不是完美的。比如它既可以用来支援人权活动家，也可以用来支援当局的支持者及犯罪集团。因为这种方式缺少透明度，其点对点的资金传递方式是非法团伙，比如贩毒集团洗钱的主要途径。因为它没有书面记录，也可能给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援助。

物资援助：外国的物资援助可以支持反对派开始运动。物资援助可以包括提供手提电脑、打

印机、发电机、便携式传真机、卫星电话、移动电话和相关活动设备，比如纽扣、勺子、喇叭等等。但是，物资援助尽管有用，但是传输物资要比现金困难得多，而且也容易招致独裁政府的注意。

能源援助：在那些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对地方有目标的放宽制裁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比如在米洛舍维奇统治的塞尔维亚，欧盟为独立的市长提供热能和石油，对米洛舍维奇的忠诚者则实行能源禁运。这个项目被称为“能源换民主”，其目的是为反对派争取公众支持和显示摆脱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的益处。

网络资源：网站和博客一直被认为可以为非暴力运动的手段和路径提供重要信息。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一直告诉全世界的活动家如何使用非暴力来对抗压迫。“电子革命”（iRevolution.net）这样的博客提供了很多让非暴力运动变得吸引人的案例。“民主社区项目”（the Project of the of Democracies）网站提供了《外交手册》，探讨如何使用外交手段提升一个国家的民主。从埃及到叙利亚，这些网站都将其他国家推翻独裁者的经验传授给本国的活动家，以增强他们经过时间考验的技巧。仅仅在 2011 年，阿拉伯文版的 CANVAS《非暴力抵抗行动手册》就被下载了超过 1 万 5 千次。

培训活动家：很多像 NDI、IRI、FES、KAS、民主威斯敏斯特基金、阿尔弗莱德·莫泽尔·斯蒂庭（Alfred Mozer Stichting）这样的 NGO 会资助外国专家，帮助他们培训国内的非暴力运动活动家进行政党建设、动员方针和选举监督。在那些外国训练师不能进入的国家，培训则在邻国进行。NDI 这样的 NGO 组织还设立训练师培训项目来帮助核心活动家了解如何培训其他人。不过对于捐款人而言，培训项目往往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由于培训师不了解当地文化，因而无法适应目标国的国情，同时又缺少对培训效果的跟进。

培训反对党成员：很多国际组织为极权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培训反对党党员。像 NDI、IRI、FES、KAS、民主威斯敏斯特基金会、阿尔弗莱德·莫泽尔·斯蒂庭（Alfred Mozer Stichting）会培训新的政党成员如何参加竞选，以及如何组建一个地方、地区或者国家的政府。对于党员的培训课程包括：公共演讲、选举的技巧、党内沟通、竞选管理、民意调查和政治意识形态。像 IRI 这样的组织经常把培训计划外包给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使政党可以用来检验活动信息和选区的民意情况。

培训独立媒体：像 IREX 或自由之家这样的国际 NGO 也会为当地的独立媒体和记者提供培训项目。在极权国家，这些培训会教授当地的记者如何进行客观报道、如何摆脱官方媒体的束缚。教授不同媒体如何吸引不同的关注和如何筹款。

培训地方选举监督员：培训项目还包括训练潜在的选举监督员。特别是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和伪民主国家，选举监督员可以有效地发现选举舞弊，进而发动群众反抗当局。揭露当局选举舞弊对于发动群众推翻独裁者尤为重要，这一情况在 2000 年的塞尔维亚民主运动，2003 年的格鲁吉亚民主运动，2005 年的乌克兰民主运动中被反复验证。在上述三个案例中，国际组织为这三个国家培训了数以千计的选举监督员，他们都具有发现选举舞弊，发布真实选举结果的能力。在塞尔维亚的案例中，地方选举监督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米洛舍维奇要求第二轮总统选举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对于选举监督员的培训需要和当地的情况相适应。在那些没有选举制度的国家，培训选举监督员的作用不大。

培训警察和军队：警察和军队往往是当局武力镇压抵抗运动的主力。正因为如此，外国政府和国际 NGO 都拼命想使军队和警察民主化。特别是在那些刚刚摆脱独裁统治但还没有真正建立民主的国家，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培训军队和警察。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教授他们如何服从国际人权标准和遵守法律。20 年来，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警察的培训在提升当地这些训练民主程度中有了重大的作用。在一些冲突地区，比如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索马里，这类培训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幸的是，很多由 FBI、美国缉毒署和国务院资助的与这类国家警方的合作很难真正对该国的民主进程产生影响。事实上，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有些培训甚至于维护人权相冲突。（详情参见 Thomas Carothers 的作品）

培训法官、检察官和公益律师：为了促进非民主国家或者新兴民主国家依法治国的进程，国际 NGO 组织可以给当地司法机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设计一个多方面的培训计划。培训这些人的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如何依据法律程序对待嫌疑人和代理嫌疑人，如何根除腐败和处理积压的案件，保护市民平等旁听庭审的权利。

培训活动家：对于培训项目普遍的批评是这些项目缺乏对特殊国情的考虑。外国训练师不了解本地活动家所处的政治环境。我们这个问题想到的解决方法之一，是让其他国家的活动家去指导培训，而不是依赖那些所谓的“权威”。在这一思路下，CANVAS 给了那些活动家和培训师一个机会，即将他们通过非暴力运动推翻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的经验传授给那些正在努力推翻本国独裁者的活动家。到目前为止，CANVAS 已经培训了十几个这类国家的活动家。

民意测试：在那些允许选举的独裁、专制国家，NGO 和外国政府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来检测人民对现政权和反对党的支持程度。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提升活动家的士气，鼓励反对派联合起来。在推翻塞尔维亚的运动中，外国捐助者曾经发起民意调查来提升反对派和公众推翻米洛舍维奇的信心。尽管民意调查作用巨大，但是在非民主国家，民意调查的结果很可能不准确，在那些缺乏选举实践的地区甚至可能没什么用。同时，反对派也对民意调查持谨慎态度，因为民意调查可容易被政府操纵和利用。

选举监督：选举监督是外国介入某国民主进程的关键方式之一。一旦受到邀请，IFES、OSCE、IDEA、联合国和其他很多国际组织可以提供一系列选举监督的行动，进入非民主国家监督选举的质量。他们对于选举舞弊现象的谴责可以鼓动人民走上街头，为“选举革命”播下星星之火。选举监督曾经降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选举公平等级，谴责他们的投票既不连贯又错漏百出，他们的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选举监督还需要和那些受当局收买的选举监督员对抗，因为两方面的报告完全不一样。不过，这种评估方式只会降低那些自称民主的非民主政权的合法性，但对于短期内的民主建设少有裨益。而且，选举监督需要得到非民主国家政府的邀请，独裁者是不会发出这种邀请的。国际社会也许应该更加积极地游说各国政府接受选举监督，同时谴责独裁政权拒绝监督的行为。

拍摄非暴力抵抗活动：拍摄视频片段和纪录片可以对本国的活动家有教育和鼓舞的意义。纪录片《推翻独裁者》记录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塞尔维亚非暴力运动抵抗斗争的成功和挫折。颜色革命前，这部影片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公共频道公开放映，它还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缅甸语、波斯语、法语、印尼语、汉语、俄语、西班牙语、乌兹别克语和越南语。不过，虽然纪录片在世界非暴力抵抗教育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它对于活动家本身的作用很难准确评估。

制作非暴力抵抗电子游戏：电子游戏是一个有趣又有创意的学习方法。美国断路游戏公司（Breakaway）发行了一个互动的电子游戏《一种更强的力量》，游戏要求玩家通过召集团队，争取公众支持，削弱支持当局的支柱来学习推翻独裁政权的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和战术。这个游戏是由原塞尔维亚学生组织“抵抗”（Otpor）的活动家设计的。

召集名人声援：争取有声望的名人的支持是外部干预的方法之一。这些名人的声望既可以吸引公众的关注，也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比如明星乔治·克鲁尼和米娅·法罗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吸引公众对达尔富尔暴力事件的关注。2006年，克鲁尼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帮助南苏丹独立争取支持。但是除非这些名人能够长期在一件事情上倾注精力，否则他们的影响可能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常常批评名人只关注极少数的小问题，而忽视本该重视的大主题。

开演唱会和发起公共事件：邀请知名音乐人参与的大型演唱会可以为某个紧急事件募捐，还可以吸引公众对该事件的注意。比如1984年，鲍勃·格尔多夫组建爱德乐队，为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募款。从那时起，其他音乐人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比如U2乐队的博诺曾经演奏《为了变革而鸣》。就像其他名人一样，这一类盛大的活动很容易筹集资金，歌星和歌迷的团结也可以为独裁、专制国家的活动家提升斗争士气。不过，在没有持续变革的长远愿景和没有清晰的战略方法的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不会长久。

说服宗教领袖：宗教领袖总是有很多追随者，他们也擅长使用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影响力，进而得到捐助。通过争取这些宗教领袖的支持，海外人士可以从当地社区募集资金支持国内的活动家。这样既可以赢得海外公众的支持，也可以对独裁、专制国家造成政治压力，还可以提升国内活动家的士气。特别是移民社区的宗教领袖尤其擅长此道。不过，和强权国家属于不同宗派的海外人士要谨慎使用这一手段，特别是在当地语境下的伦理和宗教敏感时期。这一手段很可能被独裁者当作是外国干预和宗教阴谋的证据。

对非暴力抵抗运动进行嘉奖：另一种提高对侵犯人权案例关注度的方法是颁发年奖或者半年奖给非暴力抵抗活动。很多组织都设置了这类奖项。比如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奖”，奖励那些为了推动全世界人权和民主而战斗的勇士。2011年该奖颁给了“突尼斯和埃及人民”，因为他们为了民主努力拼搏，不畏牺牲。这些组织设立这类奖项的目的是为了褒奖高尚的抵抗行动。但除非辅之以丰厚的奖金，这些奖项往往鲜为人知。

大学捐赠教学设施和教育资源：大学可以捐赠教学设施，也可以提供其他教育资源。这样可以使受捐赠的抵抗运动得到公众的关注，还可以分享大学对非暴力运动的研究成果。大学还应该建立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教育政策，为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类福祉做贡献，不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独裁统治的支持者。

奖励叛逃者：从2006年起，易卜拉欣基金会在非洲设立了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奖，旨在奖励那些在任期内政绩卓著，到任或者在任期结束前交出权力的非洲领导人。该奖在过去10年颁发了近5百万美元，在未来每年还会颁发20万美元。这个奖项的目的是以物质奖励的形式鼓励政府首脑依法办事，促进民主的进步。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给那些背叛独裁者的人以相似的奖励呢？奖金的额度可以适度调解，对先叛逃者加大奖励，对后叛逃者依次递减。当然，设立这些奖项之前必须确保人权侵害者不会变相受益，或者从中获得保底的奖励。假如这是可行的，对叛逃者的奖励可能会增加背叛独裁政权的人数。

建立独裁者名录：设立独裁者名录是另一个可以使公众注意独裁政权的办法。很多组织，比如自由之家、贝塔斯曼基金会和经济学家智库，已经设立了民主目录。但是却没有一个完整全面的独裁者名录。《游行》杂志提供了一个“世界最差的独裁者名单”，但是没有对名单入选者的入选标准做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在未来，个人或者组织应该考虑发展一个详细地、分门别类的列举独裁者的计划，该计划可以每年评选“年度最差独裁者”。这个事件很可能会吸引媒体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犯罪，同时可以指名道姓地羞辱世界上最差的独裁者。

讨论最优方案：海外人士可以考虑联合起来创立一个虚拟的平台，用来讨论和分享最优的非暴力解决方案。援助者、决策者、学者和活动家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外国援助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

建立线上信息交换平台：一个有可能扩大非暴力抵抗运动渠道的方法是发展一个致力于非暴力抵抗路线的信息交流所。当更多考虑走非暴力抵抗路线的个人和团体出现时，一个有组织的信息交流所可以帮助他们协调行动，同时该交流所还可以实现最优方案共享、让全球的活动家形成网络，交流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不过这可能会给那些没有安全技术或者网络足迹被追踪的活动家带来麻烦。

召开年度会议：很多组织已经在训练活动家理解独裁、专制国家的内涵和提升虚拟的非暴力抵抗。为什么不干脆组织一个年度会议，让这些活动家、学者、专家和决策者一起讨论非暴力抵抗可以运用的新技术、一线活动的经验教训和如何协调各地的活动家呢？这个会议可以引发人们开启一个关于非暴力运动重要性的跨国讨论，就像“达沃斯论坛”在经济讨论中的地位一样。有朝一日这个会议可以成为永久性的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援助非暴力公民不合作技术的传播。

及时回复活动家的咨询：任何人，只要在相关领域（制裁、外交、公共关系、广告、IT、网络等任何领域）具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帮助活动家建立一个危机中的快速回复团队。不过，这一团队必须和一线的活动家保持高度互信，并且拥有日常交流的安全手段。

建立年轻活动家网络：尽管有脸书、推特和其他网络聊天室的广泛传播，仍然有许多活动家对世界其他地方活动家的斗争经验和教训所知甚少。为什么不准备一个跨国的网络平台，供非洲、中东、南亚、前苏联国家，以及世界各地从事相似斗争的人们使用呢？这一网络可以让活动家从互相学习新的对抗强权的方法。其他国家同伴的传奇故事可以为本国活动家的斗争提供灵感和素材。不过正如线上信息交流所和年度会议一样，我们必须清楚这种网络也有暴露出某人是活动家的可能性。

为活动家奖学金：提供奖学金是另一种外部人员可以用来支援与独裁斗争的活动家的方法。给活动家奖学金可以给活动家提供网上培训材料的访问权，或者支付他们国际国内的教育费用。奖学金不仅可以让活动家学习知识，还可以让他们构建网络和募集资金。不过在提供奖学金的时候，外国机构必须要明白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造成独裁政权的人才流失，不应该鼓励活动家离开最需要他们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国外的委培教育的活动家，在回国后很可能被抹黑成局外人或者外国间谍。

建立推特论坛：很多世界知名的活动家通过社交网络来传递消息。不幸的是，他们很少有机

会在线下分享经验。海外人士可以组织和资助这一类线下的社交网络论坛，以供推友和脸书朋友线下相聚并结成友谊。

绘制支持者图：每一个独裁政权都依赖其忠实走狗、商业伙伴、军事联盟、裙带关系和家庭成员才能控制和维持政权。通过绘制这张关系图，活动家可以试着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削弱支撑独裁政权的支柱。海外人士可以通过绘制“关系图”给这些支柱造成第一条裂缝。“关系图”包含详细分析那些当局继续执政所必须依赖的关系：他们可能是宗教、贸易、洗钱、培训、知识、后勤等等。通过“关系图”，海外人士可以协助开启一个全球性对话，以讨论如何拆散这些关系。

揭露独裁者：和国内的活动家密切合作，海外人士可以公开独裁者及其官员的个人生活信息，比如邮件、家人上学的学校、家人常用的社交地点。国内活动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发动非暴力抵抗，比如静坐或大规模抗议。同时海外人士还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对这些官员进行定点惩罚。

制作非暴力抵抗问答手册：海外人士还可以制作一些在不同语境下的非暴力抵抗问答手册，为国内的活动家提供各种问题的应对技巧。比如埃及的政党正在准备大选，公民社会如何针对候选人的言行进行监督，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方法。这些手册可以由国际 NGO 设计，让国内的活动家了解这些方法，并且知道如何应对，以赢得重要的政治空间。

建立国际规范标准：国际规范标准可以非常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发生人权侵犯事件的国家。国际规范标准，比如保护责任、言论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等，经常被国内的活动家用来给本国政府施压，并且游说外国政府支持他们的主张。国际规范标准还可以作为粘合剂，把持不同政见的人联合在一个共同的、相对冲突较小的大的框架之下。比如言论自由有可能使保守派和自由派、世俗论者和穆斯林、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些往往被视为持完全相反政见的人联合起来。需要注意的是，很少有独裁者公开反对民主，他们大多声称自己全心全意拥护民主。但独裁者经常宣称自己才是这些国际规范标准的解释者，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施加国际压力：全球组织、个人和公司联合行动可以给那些独裁、专制国家的反民主立法和人权侵害事件施加影响。一个最成功的案例是对乌干达反同性恋提案的国际声讨。2011 年的 4 天时间内，“全力以赴”（All Out）等国际组织从 192 个国家和 10 个地区收集了 50 万个签名谴责这个要求对同性恋处以死刑的法案。这些组织带来的巨大国际压力迫使乌干达政府暂时搁置了该法案。但是 2011 年 10 月又重新启动了该提案的辩论进程。这显示了，国际压力想要真正奏效，不仅必须连贯持久，而且还需要和其他形式的抵抗、谴责相配合。

国际商务透明化：尽管强权政府有丰富的财政资源，他们常常使自己的人民处于或者濒临贫困状态。“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运动迫使政府财政透明化，确保人民监督官员的权利。为什么不让这个运动更进一步呢？政府财政透明化应该扩展到所有与独裁政权打交道的政府、公司、组织和个人。这种透明化不应该仅仅由法律强制来完成，更应该辅之以国际社会的监督。NGO、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联合起来，确保经济的发展不能从践踏人权中牟利。

外国记者：强权政府往往会在镇压自己的人民之前先把外国记者撵走。这时，外国记者进行报告往往会带来额外的风险，他们的勇气很可能引起国际社会对强权政府的谴责。在也门，

这些外了记者经常被禁止使用信用卡，这使他们不可能在这些国家进行报道。海外人士应该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允许外国记者合法地使用信用卡。这需要努力游说西方政府给这些极权国家施加压力。

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教育：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常常对他们的政策移植到独裁、专制国家将会产生的负面后果缺乏理解。尤其在互联网技术方面，一些以正当理由制定的政策，在独裁、专制国家却会给活动家带来危险。比如打击网络犯罪的政策，可能被独裁当局利用，作为打击言论自由的法律。同样，打击盗版的政策在独裁、专制国家也可能成为威胁言论自由、破坏创造力的手段。西方国家的公民应该教育他们的政策制定者不要在制定政策时产生类似的“连带伤害”。

国际视频会议：同步分享视频会议是另一种海外人士可以使用的促进活动家和国际社会交流的工具。像“通路”（Access）这样的组织已经开始使用视频会议让公司高层、政策制定者与抗议中的国内活动家直接接触。比如也门抗议者发表的演讲立即通过视频会议在美国的团体会议上进行直播。这些视频可以通过画面直接显示活动家面临的冷冰冰的威胁和人们赤裸裸的不满。视频会议不仅可以提升对独裁、专制国家人权被侵害问题的关注，也可以给那些为虎作伥的公司施加压力以改变政策。作为一个可能会产生力量的武器，视频会议需要大量且仔细的后勤准备。它们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比如活动家可能因为参与到视频中而被逮捕的时候。

现场直播：想要引起公众对一国人权侵害的重视或游说立法者制定法律阻止某个政府特定的人权侵害行动，抵抗组织可以拍摄人权侵害现场或抗议现场的影像、图片。比如半岛电视台通过直播来报道埃及革命，“全球革命”网站通过直播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直播在记录大型抗议活动和揭露当局人权侵害的时候非常有效。这些画面可以被用来刺激全球的公众监督独裁政权作出的保证，以及激励外国的决策者行动起来支持民主运动。

激光：让决策者、公司、个人关注人权侵害或者抗议活动的一个方法是用大功率激光把人权侵害的图片投射在人群密集的广场上。一个被称为 L. A. S. E. R. tag（镭射枪计划）的涂鸦研究室发明了好几种用镭射枪把墙上的涂鸦投射到几百英尺外的方法。不过尽管这种方法有助于将人权侵害案件公之于众，但其效果可能很有限。而且除非组织大规模行动，否则很容易被当局所控制。比如 2008 年涂鸦实验室曾经想用镭射枪把“自由西藏”的信息发送到北京各地，但是计划失败后，涂鸦艺术家詹姆期·包德利在中国被逮捕。

证据收集和记录保存：海外人士还可以为那些致力于揭穿当局秘密的活动家提供载体和场所。外国行动者可以提供电话或者邮箱让国内活动家可以将他们知道的关于人权侵害的秘密发送出来。不幸的是，这类数据库往往非常脆弱。外国行动者必须对此非常谨慎，务必确认这些人权数据被妥善保存和加密，绝不能泄露活动家的身份，更不能损毁证据，因为这些在未来都是呈堂供证。

绘制危机地图：在那些正在发生人道危机的国家中，“危机地图”绘制者可以使用手机和网络申请参与式地图、众包人权案件数据、航空和卫星拍照、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平台、图像分析，以及通过计算机模型和数据模型进行早期警告，提示读者危机发生的位置。

“目击者”（Ushahidi）是一个非营利的技术公司，致力于发展信息收集、互动地图、开放

源代码软件，将信息可视化。为了应对 2008 年肯尼亚后选举时期的暴力，“目击者”允许用户们使用基础设备，比如手机、电子邮件和推特来提交人权侵害的证据和报告。不过“危机地图”对于网络崩溃的应对能力非常脆弱。

自由无人机和空中监视：无人机通常被用来进行军事行动。现在，人权活动家也在探索无人机的新用途。因为无人机是一个空中监视工具，可以被部署在像叙利亚这样的战区来监督人权侵害事件。无人机有多种多样的优势：它在天上飞，可以回避人权观察家经常要面对的暴力；它可以抵达观察家抵达不了的地方；它携带高分辨率相机，可以取得大多数手机和手持照相机清晰度达不到的图像；它还可以帮助人权团体清点到场的抗议者人数，查明政府部署的军警和武器所在的位置，识别即将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犯罪。

无人机正变是越来越便宜，目前的价格只有几十万美元。因此，将无人机用于人权、环保维护领域不再是幻想，它正在被各种行动所实践。比如在南半球，环境小组海洋领航员社会保存者正在使用无人机监控日本的捕鲸船。在波兰，活动家使用无人机记录警察对华沙全城抗议的镇压。在上述事件中无人机都记录了它所部署地区的犯罪证据。在未来，无人机还可以被用来传递物资。比如把教育材料或者卫星电话、U 盘空投给活动家。

尽管无人机功能强大，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在独裁者眼里，无人机很可能是非法的，被视为对其领空的侵犯。如果使用不当，无人机也可能被超越人权维护范围使用。不仅如此，国际无人机还有可能被独裁者指责为活动家与境外势力勾结的证据，而本地无人机操作者会面临政府的报复。

卫星：部署卫星也可以让国际社会监督人权侵犯案件的爆发。在苏丹，“苏丹守卫计划”租用了一架间谍卫星来监督潜在的暴力源头。但是卫星非常昂贵。而且有证据显示，政府可能采取很多回避卫星监控的方法。比如伊朗就曾向叙利亚政府提供阻断卫星电话信号的技术。

科技人员——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在过去 10 年间，互联网已经越来越成为海外人士与国内活动家交流的重要工具。很多在线沟通软件都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不过有些还是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以下是几个国际活动家使用的支持国外民主运动的方法。

请注意：以下方法有可能给使用他们的组织或个人带来危险。很多国家的司法系统会对这些行为施加严厉的民事或刑事惩罚，因为这些行动有可能干预或者阻碍电子交流和商务交流。作者不对这些行为承担责任。

举报人维基：体制内的人常常有料可爆，他们了解当局的软肋，掌握翔实的人权侵害证据。越来越多的活动家正在思考一些创新的方法去鼓励体制内的人站出来，把他们知道的证据向国际社会公布。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互联网。互联网可以提供平台给举报人，让独裁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付出代价。创建一个词条就可以起到这一作用，就像“维基解密”那样。

2006 年成立的“维基解密”是一个在线国际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专门发布那些媒体成员或

其他人泄露给他们的机密素材。这个组织在 2010 年因为播放美军空袭伊拉克导致一名伊拉克记者死亡的视频而名声大噪。“维基解密”还揭露了许多独裁、专制国家的腐败丑闻。比如揭露突尼斯的腐败问题为突尼斯人推翻本阿里总统助力。“维基词条”能不能在其他极权国家实现相似的民主促进效果呢？很多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如果被合适的处理，“举报人维基”可以为所有愿意站出来的体制内人士，或者任何持有人权侵害案件证据的人提供一站式平台。不仅可以提供翔实的反民主活动证据，还可以通过揭穿当权者的假面具，来打击独裁当局的合法性。当然，举报人很可能会遭到当局报复。如果信息不被妥善审查，“举报人维基”很可能会成为推脱责任、寻找替罪羊或者与暴政无关的报私仇的便利工具。另外，在那些有线人-记者保密协定法律的国家，泄露机密数据会让经营“举报人维基”的人面临法律风险。

非暴力共同体 App: 智能手机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通讯工具。它既可以让国内的活动家之间保持联系，又可以让他们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或称“非暴力共同体 App”可能会强化智能手机在促进民主运动中的作用。“非暴力共同体 App”可以有多种用途。比如可以提供非暴力抵抗技术指南，并不断进行更新，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活动家形成网络，或者警告朋友和家人统治当局即将崩溃的信息。这些 App 可以通过 iTunes 或者安卓商城下载。活动家可以把自己在一线的行动上传到“非暴力共同体 App”上，让其他地方的活动家知道抗议活动在哪里发生，当局采取了什么行动想把他们扼杀在萌芽里，还可以交流每天的心得体会。

目前，还没有任何正式的“非暴力共同体 App”。不过，有以下几个点子可以刺激大家的灵感。比如在亚利桑那州有一群帮助非法移民的活动家，他们设计了一个智能手机 App，这个应用可以让非法移民在被逮捕的时候，可以立即通知朋友家人、律师和领事馆。同时这个 App 还可以让第三方知道逮捕行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提醒用户法律赋予他们有哪些基本权利，比如沉默权。

如果设计符合活动家的需要，这些应用 App 甚至可以帮助活动家发起非暴力抵抗行动。不过 App 也可能存在风险，比如“非暴力共同体 App”可能暴露用户身份，也可能被警察用来监控活动家的短信和电话。设计 App 也很昂贵，差不多需要几十万美元编程和维护。而且，App 的功能不仅依赖于它的有效性，也依赖于智能手机使用的前景。已经有不少统治当局开始限制智能手机的使用。比如叙利亚为了打垮社交媒体反对阿萨德的活动，最近禁止了苹果手机的销售。

网络镜像: 在那些反对派网站被关停的地方，网络“镜像”技术可以让这些活动家的网站继续留在网上。“镜像”技术在那些有政府严格审查的国家广泛使用。该技术可以让网络技术活动家给已知网站创造出准确的“镜像”，复制原网站的内容，然后贴到其他网址上。

在中国，使用“镜像”技术非常普遍。比如 2012 年中国政府禁止了 Google，海外的网络技术活动家绕过官方设置的防火墙，用“镜像”网站 elgooG（谷姐）作为替代。最开始的时候该网站只是对 Google 的简单模仿，用 elgooG 搜索可以得出和 Google 一样的搜索结果，只是所有结果都是倒着的。后来该网站被中国的活动家用来回避政府的审查（翻墙）。

（编者注：目前 elgooG 已被 Google 收购，所有在该网站搜索的内容会自动跳转到 Google 的相应链接，不再具有“翻墙”功能。）

“镜像”技术已经逐步成为活动家保留网站信息的重要手段。但是它可以被追踪，所以也是有风险的。如果本国活动家使用“镜像”技术，很可能遭到当局的迫害。“镜像”技术难度也比较大，很难把原网站所有动态内容都复制出来。

开源技术：近年来，开源技术促进了国内和国际活动家的交流。开源技术使网络技术活动家可以将已有的网络技术按照符合当地国情的方式定制。海外人士可以训练本地活动家如何使用开源技术，比如带有解码器的自生系统。

人们普遍认可，开源软件可以成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重要工具。比如 2004 年，“国际民主运动”的成员呼吁研发突破各国网络审查技术的开源软件。人道援助组织对开源软件技术潮流也不甘落后。比如一群在美国的叙利亚活动家成立的人道援助组织“叙利亚追踪者”(Syria tracker)设计的“叙利亚危机地图”就是以“全球疾病警报地图”(HealthMap)的开源软件数据收集平台为基础而设计的。“叙利亚危机地图”可以收集几千个英语频道的信息，发布在危机地图上，以此提醒人们叙利亚正在遭受的人道灾难。“目击者”也将开源软件技术用于他们的危机管理系统。

开源软件的好处在于成本极为低廉，甚至零成本，和它可以被修改以满足不同需求的特点。不过，批评者称这类软件技术含量不高，不可信赖。尽管如此，开源软件仍然利大于弊。因此，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当局也开始接纳 Linux 这样的开源软件，作为商业巨头微软操作系统的替代品。

全球代理云：在网络使用被当局监控的国家，代理云可以让它的用户通过一个支持者的网络（经常驻地在海外）绕过国家审查，与其他成员、国际媒体和全世界关心此事的公民直接沟通。

今天，很多组织通过“突岩计划”(Tor)为独裁、专制国家的活动家提供代理去接口。“突岩计划”是一个匿名的翻墙计划，是使用代理去技术的大胆尝试。它通过一个全球的志愿者计算机网络修改用户的路径，使当局几乎无法追踪用户的 IP 地址。通过“突岩计划”，很多团体，比如“通路”(Access)，已经设置了可以摆脱当局监控的代理云。

“热点之盾”是一款为安全上网设计的免费软件，它和“突岩计划”类似，但比“突岩计划”速度更快，但是匿名性较差，这意味着它的用户更容易被当局监控。

云代理虽然提供了一个绕过当局监控的好办法，但是普通用户很难使用。尽管像“通路”这样的团体已经尽可能地让这一工具便于普通用户使用，但是云代理目前的目标用户仍然局限于网络技术活动家。更重要的是，云代理必须依靠一个好的网络环境，对于网络发展程度较低或者被当局关闭的网络则发挥不了作用。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低技术或者无技术手段可能更有效。在网络被关闭的国家，网络技术活动家建议使用“多跳网络”。另外，因为云代理让活动家摆脱了当局的监控，当局可能会狗急跳墙，使活动家可能面临额外的风险。

多跳网络：在那些互联网被监控或者被关闭的国家，“多跳网络”可以让活动家绕过政府主导的网络，回避政府的审查。作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网络行动方式，“多跳网络”越来越受

到外国活动家的支持和青睐。

“多跳网络”是一种通过连接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无线设备构建的互联网之外的无线沟通网络。在那些政府监控或者关闭网络的国家，像“开放技术先驱”、“私人实验室”（FabLab）和“网状网络”（FabFi）这类组织正在教授活动家如何利用手机、普通笔记本电脑设置“多跳网络”节点来建立“多跳网络”。这些节点可以让活动家不需要官方网络就可以互相沟通，这样就避免了国家监控网络的屏蔽。

虽然“多跳网络”在网络技术活动家社区越来越火，但它仍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大型上行线路带宽的多跳网络成本非常高昂，国内活动家很难承受得起，需要国际组织提供资助。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解决方案是网络提供者购买大量贷款，或者海外人士带宽捐赠给“多跳网络”。（编者注：就如用BT下载电影那样，下载的人越多，下载的速度越快。加入并使用“多跳网络”社区即可以达到捐赠带宽的目的。）

分享额外带宽：为了快速传输数据，“多跳网络”需要大量带宽。但是购买带宽的价格非常昂贵。网络技术活动家认为普通公民帮助极权国家的活动家建立独立“多跳网络”的方法之一就是捐赠他们不用的带宽。

很多互联网用户每月只用他们付费带宽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带宽是空闲的。因此“网状网络”（FabFi）这类组织建议公民将他们不用的带宽捐赠出来。网络技术活动家正在努力研发更便捷的带宽捐赠程序，让网友可以把他们不用的带宽捐赠给需要的组织和个人。

制作网络防御手册：在强权政府越来越善于发动网络战争的同时，国内活动家也在想方设法对这种进攻进行还击。海外人士可以通过制作网络防御手册来帮助他们。这些手册线上、线下均可发行。手册内容包括活动家可以在网络关闭前、中、后使用的简单防御手段。全球数字全力促进组织“通路”（Access）曾经广泛制作和发行网络防御手册，现在此手册已有6个语言版本。该手册的目标用户是中东和北非的民主活动家，它提供了一份用户防御和还击“洪水攻击”（Dos）的详细指南。

网络防御手册可以被强权国家的民主活动家用作教育资源。但和其他工具一样，网络防御手册也其弊端。比如网络防御手册在网络上传播会引起当局注意，当局会把上传者视为反对者。另外，新的病毒和“洪水攻击”经常更新，网络防御手册也需要持续更新才能跟得上威胁发展的速度。

制作数字权利事件日历：强权国家总是在大事发生前发动网络攻击，比如大选、两会。为了帮助活动家应对即将到来的进攻，“通路”设计了一种数字权利事件日历，它列举了所有重要的会议和所有与全球数字相关的权利，其中还包括国际大事件。比如大国的大选或者立法提案等相关议题，这一举措很可能对数字权利和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制作电子防御网：网络攻击总是在瞬间发生，让很多活动家措手不及。为了帮助活动家和独立新闻网站做好应对网络攻击的准备，“通路”（Access）发明了电子防御网络。该网络让国内的活动家可以和一个值得信任的外国专家取得联系。专家为他们提供沟通技术和战术方面的指导。当网络攻击发生时，专家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洪水攻击防御”保险：有很多方法可以防御“洪水攻击”。目前最先进的方法是在服务器上加载一个“洪水攻击防御”（DoSP）。但是安装“洪水攻击防御”需要高昂的费用，这让很多非营利组织望而却步。但是通过购买“洪水攻击防御”保险，成本会降至人人都可负担的水平，进而普及“洪水攻击防御”的安装。这又会进一步降低“洪水攻击防御”的价格。尽管处于探索阶段，“通路”（Access）正在考虑如何创新的设计这一保险政策。

（详情参见 www.access.org）

请千万注意，以下战术存在严重的法律风险。使用这些战术的风险请使用者自行承担。

洪水攻击：“洪水攻击”（DoS）和“分布式洪水攻击”（DDoS）是最具争议的非暴力干预手段。“洪水攻击”是一个或者多个个体组织和发动的对某个网站或者服务器的系统攻击。“洪水攻击”的目的使该网站不能正常运转。“洪水攻击”往往会造成系统过载，使受攻击的网站不能继续提供服务。

“洪水攻击”已经被证明有巨大的威力。独裁政权凭借“洪水攻击”可以审查网络，封锁重要信息。不过，“洪水攻击”也越来越多地被网络技术活动家用来瘫痪支持独裁政权的网站和服务器。比如在叙利亚，黑客组织“匿名者”被指控对政府网站发起“分布式洪水攻击”。在2011年7月发起的这次“洪水攻击”，让叙利亚的海外大使馆遭到沉重的打击。“匿名者”称，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降低政府机构之间沟通的速度，停止政府“孤立和恐吓”叙利亚人民的行为。因为有巨大的争议，在叙利亚活动家的要求下，这些攻击被叫停。叙利亚活动家的理由是“洪水攻击”造成叙利亚带宽过载，导致登录反对派网站和反对派内部的交流也变得非常困难。

电子战非常在很多国家被正式列为军事冲突。因此，“洪水攻击”应该被归纳为暴力斗争手段，而不是非暴力斗争手段。批评家认为“洪水攻击”造成了坏的先例，使非民主国家政权可能会在未来对外国发动类似的攻击。而且就像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一样，“洪水攻击”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瘫痪对手的同时也堵塞了反独裁者的网络。（本文作者不认为“洪水攻击”是非暴力抵抗战术的一种）

电脑病毒：电脑病毒也可以被海外人士用来反对独裁者。但这一手段争议很大。电脑病毒可以在一瞬间从伊朗传染到利比亚，它曾经被用来阻断当局的通讯，以及对基础设施造成损害。根据不同的目标，电脑病毒可以削弱独裁者的统治，也可以对体制内的成员和反对派的成员造成影响。

毫无疑问，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子病毒就是“震网”（Stuxnet）。这是2010年7月被发现的一种蠕虫病毒，它通过微软视窗进行传播。该病毒的目标被认为是伊朗的西门子工业设施。有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政府使用“震网”对伊朗的核武器库进行了渗透。两国政府毫无疑问都否认了这一攻击。该报道还称，该病毒导致伊朗铀浓缩设备转数失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那时起，伊朗的核设施就被一连串电脑病毒攻击。其中一起发生在2012年4月，这次攻击导致伊朗当局把国家主要的石油出口终端撤离互联网。

和“洪水攻击”一样，电脑病毒有极高的风险。在未来，电脑病毒可能成为战争手段。而且，电脑病毒有很强的反噬效果，当局可以给这一攻击贴上外国阴谋的标签。（本文作者不认为

电脑病毒是非暴力抵抗战术的一种)

阻断通讯：对那些强权政府垄断电视、广播，强制消灭不满和进行洗脑宣传的国家，海外人士可以使用阻断当局通讯的方法。对当局通讯频段的干扰和阻断（包括广播、电视、互联网）不仅曾经用来阻止极权政府的宣传，也被用来传播反对派的信息。

阻断通讯频段是军事行动中经常被使用的手段，强权政府和民主政府都在使用。尽管曾经在战争中被用作阻止对方宣传的武器，阻断通讯频段也越来越被视为一种非暴力抗争的手段。正如一名军事分析家所言：“尽管阻断通讯常常作为一个军事术语被提及，但它也可以被用来发起社会运动。”比如 2011 年北约干预利比亚期间，阻断政府通讯是北约军人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他们用通讯障碍造成卡扎菲和他的军队沟通困难，进而支持利比亚起义军。

通讯障碍经常被视为一个相对被动的军事行为，因为它可能对军事目标和跨政府交流造成伤害。这意味着，阻断通讯有可能被解读为战争讯号，导致非暴力对抗升级为暴力冲突。

艺术家、记者和传媒专家——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独裁政权竭尽全力窃听和监控反对者之间及反对者与世界其他人的交流。独裁者想要阻止这些人的交流以便消除有组织的不满。海外人士完全可以帮助活动家打破这些障碍。以下是一份海外人士可以使用的技术和工具列表，这个列表可以促进独裁统治下民主力量之间的交流。

涂鸦：涂鸦是非暴力活动家经常用来对抗独裁的方法。不管是在贝尔格莱德还是在开罗，涂鸦提供了一种廉价、省时的传达不满和团结队伍的方法。特别是在网络或者手机信号被切断的时候。涂鸦还是一种可靠的信息传递方式。比如涂鸦可以是青年运动的符号，就像“抵抗”（Otpor）、“受够了”（Kmara）、“帕拉”（Pora）等组织所做的那样。这一方式也被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的反抗组织所采用。

海外人士可以给活动家提供喷枪或者买喷枪的钱来支持他们。不过，就像其他非暴力方法一样，涂鸦也并非灵丹妙药。有些独裁政府会很快清理掉涂鸦，还会使用不易被喷枪喷上涂料的墙壁和建筑。而且独裁政府的走狗或者被当局雇佣的走狗也可以使用涂鸦来表达对当局的支持。

动物信使：家禽、狗、猫、鸽子等动物都可以作为活动家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特别是在那些互联网不普及的地区尤为有效。动物信使无需高科技就可以实现城际信息的传递。信鸽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波斯时代，一些记者组织比如路透社也曾使用信鸽。海外人士可以用这些方法与国内的活动家进行交流，或者协助国内不同的抵抗团体之间进行沟通。不过，这种方法耗时巨大，还需要对动物进行培训。

非传统信息传递：气球也是一种活动家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信息传递方法。比如从 2005 年起，一些住在韩国的脱北者把数以百万计含有谴责金正恩政权内容的 USB、DVD、收音机、钢笔和便签纸，用气球送到北朝鲜。西方社会也曾经将携带反共宣传品的气球从西德飞越柏林墙

投放到东德，作为和苏联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人民进行交流的手段。气球还可以用来交换战略信息或者其他重要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在其他信息沟通手段被阻断的国家最有效。不过，气球很容易被击落。此外，根据传递信息的不同和这些信息想要抵达地区的广阔程度不同，气球使用的效果也有所不同。这一手段还可能引起冲突升级，比如北朝鲜就威胁韩国，如果继续发射宣传气球，就要对韩国“发动战争”。

地下网络：“地下网络”是一种海外人士可以用来加强与国内活动家沟通的方法。“地下网络”是指使用物理的方式交换可擦写媒体（比如 U 盘、DVD 或者外接硬盘）上的电子信息的方法。在互联网被严格审查或者高度限制的国家，活动家可以把记忆卡藏在鞋底，或者通过信鸽携带 U 盘传递信息。在这个极权政府监控手机和互联网通讯越来越熟练的时代，“地下网络”的使用在活动家之间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海外人士可以考虑发展新的“地下网络”方法，并与国内的活动家分享。

*这些方法网络技术活动家和团体也同样可以使用。

用颜色标注公共空间：使用颜色标注显示反对派团结的力量，是国内活动家可以使用的无技术限制的一种方法。用某种颜色给公共场所涂上标识，或者某一活动的参与者都穿同样颜色的衣服，正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伊朗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期间活动家所做的那样。使用统一的颜色象征着团结一致对抗镇压，传递出反对派强大的力量。海外人士可以提供指定颜色的库存商品来支持颜色标注活动，比如 T 恤、哨子、袖标、手帕等。也可以通过镭射枪发射这种颜色来表达他们对活动家的支持。甚至可以把自己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涂成这种颜色来表达他们对国内活动家的支持。颜色标注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展示反对派内部团结和对当局反抗程度的方法。不过，这一方法很容易暴露活动家。比如在伊朗，安保部队见到戴绿色袖章的人就会将其逮捕。在有外国人参与时，那些使用颜色标注方法的国内组织必须警惕当局将其污蔑为外国买办的企图。比如在伊朗，穿着“美国制造”标签的绿色 T 恤可能会弊大于利。

灯光信号：像颜色标注一样，灯光信号也是非暴力运动经常使用的方法。灯光信号是指处在强权下的人们，在某个约好的时间内一起开（关）电灯或者点燃蜡烛的行为。灯光信号有利于促进反对派的团结和向统治当局展示反对派的力量。这一方法也适合在短距离内传递信息。海外人士也可以使用灯光信号作为对国内活动家表达道义支持的工具，同时也可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那些强权统治下反抗的声音。比如在地球日，全球的环保活动家在约定的时间内同时关掉不必要的电灯，以此传达他们集体的环境共识。如果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全球灯光信号可以使那些强权国家的重大议题得到关注，同时也可以提升国内活动家的信心。

信息图像化：在识字率比较低的国家，通过图形或者图画来传递信息是一种沟通的好方法。比如在便签约或纸板上将非暴力运动的战略用图画而不是文字表达出来，是一种信息图像化的形式。海外人士可以通过气球、信鸽等方法将便签纸等物资输送到国内活动家手里。

抵抗艺术：艺术——音乐、诗歌、戏剧、视觉艺术等——都可以成为对独裁者反抗的有力标志。当地艺术家使用幽默的、具有文化象征主义的、通俗的语言，不仅可以嘲笑独裁者，还可以刺激公众参与行动，以及传递那些隐藏在诗歌和图画里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在 2011 年的埃及解放广场，歌曲、诗歌和公共艺术就被普遍使用。海外人士可以为这些艺术家提供资金、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还可以翻译艺术家创作的视频、图片、文字，把它们传播到全世界。海外的艺术家，特别是知名艺术家，有能力鼓动他们的粉丝去支持国内的抵抗运动或

者谴责统治者对人权的侵犯。

破坏广告：为了降低极权统治的合法性，海外人士可以用有创意的方法来嘲笑当权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广告破坏可以提供灵感——个人和组织可以制作、播放嘲笑和讽刺独裁、专制政权的广告。比如不久前，“南嘟”——一个南非肉鸡连锁店播放的广告，把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称为“最后的独裁者”。但这些行动也很容易招致独裁当局的打击报复。在上面的案例中，穆加贝对南嘟在津巴布韦的分店进行威胁和骚扰，使境外播放的这个广告很快被迫撤下。

大型户外广告牌：大型户外广告牌可以为活动家提供批评政府的大型可视载体。特别是在那些独裁者的铁腕统治比较弱的国家，大型户外广告牌可以让反对派与潜在的支持者沟通，扩大他们的影响。比较在 2000 年的塞尔维亚，大型户外广告牌被证明是反对派重要的反抗工具，它为反对派候选人提供支持、提升反对派团体的形象。海外人士可以给国内的活动家提供资金租用大型户外广告牌（租用费用昂贵，特别是对那些受资金限制的反对派团体），或者直接以反对派的名义租用大型户外广告牌。不过大型户外广告牌在典型的极权国家很难被使用，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反对活动都会被禁止和镇压。

海报和贴纸：一个更容易被反对派使用的工具是海报，即使是最强硬的极权政府也不能完全消灭海报。在海报上印刷抗议活动或者支持抗议活动的信息是一种廉价的，有可能快速与最广大的民众接触的方式。与大型户外广告牌不同，海报可以免费四处张贴，而且可以用来盖住当局的宣传。比如埃及的“4 月 6 日运动”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少壮派在开罗联合发起的海报抗议；塞尔维亚“抵抗”（Otpor）的成员把海报贴遍全国，呼吁所有爱国的塞尔维亚人一起反对独裁者。“抵抗”（Otpor）还用“他完了！”的贴纸贴在米洛舍维奇的肖像上，把当局对独裁者的宣传海报变成了反对独裁者的海报。海外人士为在塞尔维亚的反抗运动支付购买和制作费用，最终帮助他们推翻了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海外人士可以把海报空投到独裁、专制国家内；可以捐款或者直接海报、贴纸的设计提供想法和物资。但是必须注意，这个方法也可能被当局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从而削弱抵抗活动的合法性。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现场直播抗议活动：如果某些组织想要提升海外公众对独裁者侵犯人权的意识，或游说决策者对独裁者的某个行为采取行动，可以对侵犯人权或者抗议活动发生的现场进行直播。比如半岛电视台通过电视直播来报道埃及革命；“全球革命”网站通过网络直播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直播在报道大型抗议活动和揭露当局严重侵害人权事件中非常有效。这些画面可以吸引全球观众关注独裁当局的侵害行为，以及迫使外国政府行动起来支持民主。

恶作剧：正如恶作剧电话或者恶作剧会议是普通人可以用来嘲笑当局合法性的手段，它也可以被电视和广播工作者使用。英国喜剧和讽刺作家马克·托马斯就曾经使用恶作剧和噱头来揭露政府和大公司的行为。比如他假装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然后成功地让一名高级印尼军官承认使用过酷刑，并且把它拍成了电影。这种手段能够迅速传播，使大量观众知道，而且可以公开羞辱当局。但使用这一手段必须小心谨慎，以免遭到报复。

证据收集和记录保存：海外人士还可以为那些揭穿当局秘密的活动家提供场所和载体。比如提供一个电话或者邮箱让活动家将人权侵害的机密证据发送出来。海外人士必须非常谨慎，务必千方百计确认这些数据被妥善保存和加密。绝不能泄露活动家的身份，更不能损毁证据，

因为未来这些都将是呈堂证供。

扩音器：扩音器是另一种廉价的可以让当局的批评者与其支持者交流的工具。扩音器包括大喇叭，卡车上的音响，社区中心或宗教建筑上面的公放设备。在公开抗议的时候，扩音器可以成为重要的沟通工具。海外人士可以为扩音器，或者其他低成本的科技替代产品提供资金，或者把这些物资直接走私进国内。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用玩具和体育器材恶搞：把传统的东西，比如玩具或者足球，变成反抗当局的交流工具。比如可以把独裁者的照片贴在足球上，然后让孩子们踢着玩儿，以此羞辱独裁者。简单的玩具和体育器材只要以幽默和创造性的方式重新设计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从而提升活动家的信心，降低人们对独裁者的恐惧。海外人士可以资助或者提供这类恶搞商品。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手机：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手机被大众普遍使用，它已经被证明是方便的、低成本的反抗独裁者的交流工具。在利比亚，人们用手机制定会议日程、设计抗议和活动战略。国际 NGO 和政府除了可以赠送手机给活动家以外，还可以资助大规模 SMS 短信群发。比如在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时代，外国基金会就曾资助 SMS 短信，协助“抵抗”（Otpor）在大选期间的“鼓励投票”活动。带拍照和录像功能的手机可以用来记录抗议活动，也可以用来记录当局的侵权活动。比如在伊朗，人们用手机记录和传送警察对反抗者的暴力行径，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进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俄罗斯，手机对选举舞弊的记录相发了反普京的抗议游行，促进了人们对一个自由、公平的大选的要求。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传真机：传真机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抗议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传真机在苏联解体，甚至在中国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都起到了鼓励抗议者的作用。现在简单而低技术的传真机仍然在变革的舞台上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互联网被关闭的地方，传真机是活动家获取信息的一种低成本的工具。比如海外人士可以通过传真把对付催泪弹的医疗处方传给埃及的活动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在传输过程中没有安全程序进行加密，传真很容易被当局窃取。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蓝牙：蓝牙可以在大多数手机和电脑上使用，是一种短期内可以被活动家使用的信息传输方法。这种经常被人们忽略的技术在 2009 年伊朗的绿色革命期间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当时伊朗当局关闭了手机信号和短信服务，活动家转而使用蓝牙。蓝牙技术将臭名昭著的“Neda 女孩之死”事件广泛传播，进而引发了绿色革命。海外人士可以提供用于搭载蓝牙技术的设备和维持这些设备开启和安全运转的技术支持。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拨号调制解调器：当政府关闭互联网的时候，海外人士可以帮助国内的活动家通过传统的拨号调制解调器重新连接网络。“我们重建”组织和“法国数据网络”（FUN）曾经使用调制解调器、有线电话、传真机和广播等媒介与当地活动家重新建立联系。比如在埃及，他们使用拨号与西欧的网络相连接，摆脱了当局的控制。这意味着每一个可以拨打欧洲电话的埃及人都可以自由的连接网络。不过这种通讯方法非常昂贵，还必须电话信号畅通，电力正常运转，

电脑能够使用。而且，电话线有可能被窃听，电话号码有可能被屏蔽。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双向无线电：双向无线电又被称为便携式对讲机，它既可以发送信息，又可以接受信息。只要处于同一个频道，双向无线电就可以通过个人无线电收发器实现多个用户之间相互交流。在埃及革命期间，“Telecomix”组织提供了一个教人们如何把家用收音机改装成双向无线电简易指南。用这一方法改装成的双向无线电可以实现两公里内自由通话。海外活动家可以提供类似指南，也可以捐款用于购买双向无线电，或者直接捐赠双向无线电给国内活动家。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单兵电台 (HAM Radio)：当那些互联网通讯被屏蔽的地方，如果无线电频谱没有被当局完全屏蔽，那么单兵电台可以成为活动家把信息传递到国外去的载体。比如 1990 年叶利钦退党就是使用单兵电台发出消息，被 BBC、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采用后，又发回苏联。为了向国内活动家传授单兵电台的使用方法，“我们重建”网站详细介绍了用户如何使用单兵电台对话。“Telecomix”和德国的“海盗狂欢小组” (Piraten Partei) 也提供了详细的使用指南。埃及人之所以能用密码交流传输信息，某种程度上讲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不过单兵电台的使用并不普遍。Telecomix 后来意识到埃及单兵电台最大的发烧友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体制内成员。单兵电台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局的频谱政策，因此，单兵电台在中东就很难使用，但是在印度则很容易使用。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AM/FM 广播电台：AM/FM 广播电台也是活动家可以使用的重要工具。海外人士向很多独裁、专制国家境内的独立电台提供财政和物质资助已经有超过 10 年以上的历史。在当局进行镇压的时候，类似的援助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让人们能够听到反对的声音。在塞尔维亚，独立电台 b92 之所以能够坚持谴责米洛舍维奇政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海外的 NGO (比如 IREX) 给 b92 提供了从房租到发报机的一切费用。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小功率可调频电台 (LPFM)：小功率可调频电台让用户可以使用非常少的能量进行电子信号广播。一个普通的 FM 电台发报功率是几千瓦，而一个 LPFM 电台的一般发报功率不会超过 100 瓦。这些特性使得 LPFM 电台成本较低，但信号效果也不是很好。在最好情况下，LPFM 电台的听众也只能局限在一个社区内。

手持高频/超高频电台 (VHF/UHF 电台)：手持高频/超高频电台能够发送 30MHz 到 300MHz，甚至更高的无线电频率。这些廉价的、可使用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也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进而实行一次性垫加密模块。这些电台用户可以绕过政府的设备进行长距离沟通。在在断网断电的危机情况下，这些设备尤其有用。

*这一方法政府和 NGO 也同样可以使用。

国际电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电台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比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都将外国的信息传递到苏联境内。更近的情况是，国际广播电台把自由欧洲电台的讯号传遍中东。因为国际电台拥有漫长而有争议的历史，独裁当局对此非常敏感。在朝鲜，所有的收音机都只能接收本地电台的固定信号，而无法收听国际电台的广播。2002 年，古巴政府屏蔽了美国之音电台的广播，中国政府屏蔽了自由亚洲电台

的广播。海外人士可以设计更有力的天线或者通过单板（Single Sideboard）频繁改变发送频率。北朝鲜的脱北者称，他们就曾经走私可以接收国际信号传输的手持电台。

*这一方法政府、NGO 和 IT 专家也同样可以使用。

卫星网络解调器：卫星网络解调器可以让用户绕过政府控制的电话网络获得国外的信息。在紧急情况下，或者在手机信号和互联网被关闭的情况下非常有用。卫星或者卫星网络解调器可以让数据通过通讯卫星传送，因此可以作为一种规避技术使用。关注规避技术的海外人士可以考虑捐赠卫星网络解调器，并将他们送到国内活动家的手里。比如在埃及，海外的非政府组织不仅给他们提供卫星电话，还提供便携式网络微型解调器。但是，和卫星电话一样，卫星网络解调器也可能被监听，而且可能暴露活动家的操作位置。

*这一方法政府、NGO 和 IT 专家也同样可以使用。

卫星手机：为了避免国有电话通讯线路的拦截，海外人士可以向国内活动家提供卫星电话。卫星电话和普通电话功能很像，但它与航天卫星相连，而不是与陆地发射塔相连。现在，卫星手机已经和普通手机或者智能手机难以区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卫星电话经常被国内活动家用来互相交流。在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塞尔维亚，“国际通讯”组织给很多国内活动家提供卫星电话。当时这一技术还非常昂贵，所以很多卫星电话没有被使用。据报道，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曾经发送了数不清的卫星电话到中东和北非的活动家手中。叙利亚政府因此禁止了卫星电话，并助把使用卫星电话定为“叛国罪”。在电话信号被切断或者电力被切断的地方，卫星电话是少数几种可以让国内活动家与外界沟通的方法。不过，和所有卫星设备一样，卫星电话有明显的安全问题。2011 年 11 月，据“通路”（Access）报道，舒拉雅卫星设备用户的地址被泄露，并且落到了叙利亚政府手里。

*这一方法政府、NGO 和 IT 专家也同样可以使用。

加密数字速记：加密数字速记是一种国内活动家可以从境外获得信息的、安全的交流技术。加密速记是一种可以隐藏在数字文件中的技术，比如隐藏在照片或者图片空白处的加密技术。加密速记不是什么新技术，但也不是人人都能使用的技术，因为有许多为加密解码的方法存在，而且像巴基斯坦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已经禁止使用所有的加密技术。不过，如果进一步钻研和更广泛的传授该技术的话，加密速记技术仍然可能为国内活动家提供一个几乎完全隐藏在普通数字文件里的通讯办法。特别是在那些有着熟练监控技术的国家，如果将加密速记和其他地下网络一起使用，可能会成为活动家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方法。

外交官——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外交手段是给独裁、专制政权施压的广泛使用的方法。外交手段没有上述提及的方式那样受到争议，但常被批评为力度不够，威力低于制裁和军事干预。不过外交手段往往是更激进干预形式的前奏，如果和其他外交政策配合得当，也经常十分有效。

发表声明与行动：在一国当局有反民主的行为时，外国元首、外交部长及外交官都可以发布声明进行谴责。同时还可以声明支持反对派，为抗议的合法性背书。支持声明是对政府镇压行为表达反对态度的一种廉价而实时的手段。例如，很多人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给予 2009 年的伊朗事件更多公开的支持。但是，也有人反对此类声明，认为它会成为独裁者指控外国

干涉的证据，因而起到反作用。

提出建议：一个独裁、专制国家内或者这个国家周边的外国使馆、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外国人聚集点，在遇到活动家寻求非暴力抵抗技巧的意见时，都可以表现出欢迎的态度。在上世纪 90 年代，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为白俄罗斯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提供过建议。在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塞尔维亚，反对派领导人也曾向外国行动者和政府寻求过选举建议。但是要注意的是，此类建议必须是在对方有需求，并且对这种需求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此类建议的最终效果当然是由本国活动家自身的行为所决定。

召集活动家会议：外国活动家还可以帮助反对派领导人建立讨论会、沙龙和联席会议。在反对派候选人发生争吵或分裂时，这些方法尤其有效。这些会议可以为政治和解及联盟的形成提供基础。体制内与反对派之间的会议甚至可以为权力的和平移交，或者一个公平与自由的大选提供平台。例如，非洲国民大会和南非当局的会议就是由外交官安排在国外进行的。在米洛舍维奇被罢免前的几个月，召集反对派候选人会议促进了塞尔维亚民主反对联盟的统一。然而，通常这样的会议是昂贵的、不定时的，如果官方媒体抹黑会议的话，会产生不良后果。

帮助活动家与外国政府取得联系：海外人士还可以为当地活动家和外国政府官员提供会面场所。上世纪 90 年代，在阿尔及尔，外交官曾定期邀请反对派领导人到他们的使馆和使团，以促进与外国领导人的沟通。在古巴，类似的情况仍然会发生。在乌克兰、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大使馆还为反对派领导人提供旅行项目，这些旅行使反对派政治家有机会筹到资金，还可以让外界更多的了解其国家的困境。当然这类会议也有可能起到反作用。

监督审判：就如同监督选举一样，外交官还可以监督对政治案件的审判。例如，在伊朗德黑兰，欧盟外交官会列席法庭对杀死加拿大记者的安全人员的审判。2009 年，一些驻缅甸外交官出席了对昂山素姬“违反软禁规定”的审判。这种监督可以提升人们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共意识，同时也表达了外界对任何不公正审判的反对态度。然而，这种监督可能形式重于实质，因为归根到底，这种监督只有在大规模的公众无法容忍不公正存在的时候，情况才能发生真正的变化。

抗议：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也可以参加所驻国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在布达佩斯、圣地亚哥、马尼拉、贝尔格莱德、基辅、古巴和加德满都的抗议活动中都有外交官的身影。外交官直接参与反对派组织的活动可以增强国内活动家的信心，并凸显出其所属国家对专制政权的反对。然而，外交官的参与也可能被指责为外国干涉，从而破坏抗议者的可信度。擅自干涉别国政治的外交官还可能面临被解职的危险。

外交豁免权：驻独裁、专制国家的外交官可以使用他们的外交豁免权来保护活动家，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避难所。2004 年在乌克兰，法国大使馆、欧洲委员会和民主机制与人权办公室的外交官出现在青年活动家的家中，进而阻止了乌克兰特勤人员对这些活动家的拘捕。2005 年在尼泊尔，外交官亲自陪同反对派人士到机场，并且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反对派人士免遭拘捕。然而，活跃的外交官往往成为独裁、专制政权的目标。虽然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是他们有被自己的政府撤职的风险，类似事件在缅甸、苏丹和白俄罗斯都发生过。独裁、专制政权还会指使其支持者去恐吓外交官，例如，克林姆林宫就曾通过拥护他们的纳什青年组织对英国驻俄大使进行骚扰。

给活动家提供庇护：在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外交官或外国政府可以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庇护。二战期间，有些外交官就为犹太人、艺术家和其他少数族裔提供过庇护，避免他们受到纳粹的迫害。外交官还为南非的活动家提供过避难所。虽然这样做可以最有效地保护活动家，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改变独裁、专制政权的长期解决办法。

加入抵抗活动：海外人士也可以参与到反对独裁、专制政权的组织中去，帮助本地活动家组织抗议活动，向外国媒体传递消息。在塞尔维亚遭受北约轰炸期间，一些外国人始终留在塞尔维亚并参与组织抗议活动。在利比亚，一些外国人也加入了抵抗活动。但是，由于外国人大多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并且不太熟悉当地的环境，所以可能不具备提供有益帮助的能力，甚至成为国内活动家的负担。

外国政府——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政府总是处在军事冲突的最前沿。他们有很多方法，或者正在使用很多方法削弱外国独裁者。一些像制裁这样强制的方法，另一些超出了强制的范畴。因为政府有其他组织和个人无法匹敌的资源 and 近乎绝对的力量，他们不仅可以改变他们不干预独裁的态度（对独裁的沉默即支持），而且可以在国外直接扶持民主力量。下面是几种政府可以用来支援独裁、专制国家民主活动家的工具和技术。

对外国服务公司，军队和公务员进行教育：非暴力抵抗运动对于外国服务公司、军队和其他公务员是比较陌生的概念。民主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本国驻独裁、专制国家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更好地明白、分析和支持非暴力抵抗者，为抵抗者提供外交政策和暗中援助。

附加援助条件：外国政府支持可以用军事援助作为交换条件来支持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时，不考虑被援助国的民主状况，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在很多情况下，以反恐或区域稳定的名义忽视或者蓄意掩盖侵犯人权的事件。比如美国以反恐的名义也给也门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丝毫不顾也门军队雇佣童军的情况。政府应该以附加援助条件来刺激独裁、专制国家的民主改革。

公司：外国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或者要求本国那些与独裁、专制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公司信息公开，或者迫使它们停止与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交易。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与那些给活动家提供不可或缺的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比如脸书或者推特）合作，确保这些公司的服务安全而且不会中断。在伊朗绿色革命期间，为了避免影响伊朗活动家之间通过推特进行联系，美国政府曾说服推特改变它的更新计划。

避税天堂：避税天堂对于独裁、专制国家隐瞒财产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至关重要。由于掌握了无可匹敌的资源，独裁者常常把他们的不义之财转移到开曼群岛、马尔代夫、瑞士这样的避税天堂去洗钱。打蛇打七寸（七寸的位置就是他们的钱袋），外国政府可以禁止本国公司给注册在避税天堂的独裁者企业支付资金，还可以冻结用来转移资产的银行秘密账户，就像瑞士对卡扎菲做的那样。投资人、公司和游客可以抵制那些不顾国际压力的避税天堂，比如巴哈马。

国际商务透明化：尽管独裁、专制政权拥有丰富的财政资源，但他们却常常迫使人民处于或者濒临贫困的可悲状况。“公开你的支出”组织在全世界有 8 百多个分支机构，他们的计划是要提升各国政府的财政交易透明度，以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为什么这个计划不更进一步呢？财务交易透明化应该扩展到所有与独裁、专制政权打交道的公司、政府、NGO 和个人。这种透明化不应该仅仅由法律强制来完成，更应该辅之以国际社会的监督。政府、NGO 和国际组织应该联合起来，确保经济发展不能从践踏人权中牟利。

军事援助：正如建设援助一样，一些国家也向另一些国家提供武器和训练方面的军事援助。在独裁、专制国家，这类援助往往会被用来对付非暴力抗议活动。埃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每年对埃及的援助总额超过 13 亿美元，即使在埃及军队对对抗议者进行镇压的时候也没有削减。出资方政府应该严密监视受助方政府对援助物资的使用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至少，出资方应当确保任何军事训练不能用于侵害人权和违反国际法。

出口许可证：和军事援助一起，外国政府也经常提供武器出口许可证给那些有人权记录污点国家的军火商。比如 2012 年秋，“匿名者”国际报道称，美国国务院颁发许可证给两家向埃及军方出售化学催泪弹和暴乱控制武器，以镇压民众抗议活动的美国公司。政府可以通过签署国际武器贸易协定迫使这种情况发生变化。这一贸易协定应当包括确立新的国际许可证管理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所有制定和签署类似协议的动议都遇到了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

发展援助：西方政府每年都会支出几百万亿美元用于外国援助，而且援助对象常常是那些号称能代表国家利益的独裁政府。比如从 1975 年开始，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每年提供 280 亿美元经济建设援助给埃及政府。这笔资金可以被用于对进行民主改革的政府进行嘉奖，也可以用于对践踏公民权利的政府进行惩罚，2011 年 10 月，英国首相就曾威胁要切断对所有有同性恋入罪法案国家的经济援助。虽然这一政策很有效，但是一国政府往往要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给邻国施压：邻国经常对独裁、专制国家主动支持或者听之任之。邻国会与独裁、专制国家做生意或者把外交信用借给独裁者，这一行为变相（有时候是无意的）鼓励了专制。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之所以对邻国的人权侵害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破坏地区稳定。更进一步讲，与独裁者亲近会得到回报。比如从他们奢侈的国库中抽取一部分垄断利益，以换取商品和信用。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变这种对邻国行为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方法呢？如果西方政府和公司鼓励那些独裁、专制国家的邻国停止与他们做生意，就可以孤立这些政权，提高体制内人士“弃船”逃生的概率。

取消双重国籍身份：很多独裁者和人权侵犯者都有双重国籍身份。外国政府可以取消这一公民权以保护那些受到独裁、专制侵害的人民。

黄金降落伞：另一个外国政府可以介入的方法是和独裁者讨论特赦条件——如果独裁者愿意主动离开其统治的国家，他将会被安置到一个对其友善的国家去。比如利比里亚的查尔斯·泰勒被流放到尼加拉瓜（不过这一条件不久就被取消，因为他被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对独裁者的特赦非常有争议——虽然倡导者认为这是结束暴力的最快捷、现实的办法，但批评者认为，免去对独裁者罪行的惩罚与国际法相冲突。

在邻国建立广播站：在那些互联网被关闭或者很难接入的国家，独立媒体可以在其邻国建立广播塔和 FM 电台发射器。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时代，美国就曾援助在塞尔维亚的邻国波斯尼亚、科索沃、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建造广播塔和 FM 电台发射器。这一被称为“四面楚歌”的援助计划让塞尔维亚人重新听到塞尔维亚独立电台、美国之音、BBC、明镜电台和法国广播电台的塞尔维亚语节目。只要长期提供这类计划，这一促进民主的手段将非常有效。不过，这一建设投资巨大、耗时漫长。实际上，在上述塞尔维亚的案例中，一些信号发射器和广播塔是到米洛舍维奇倒台之后才建立和运转起来的。

移动电话“影子网络”：在独裁、专制政府完全控制移动电话网络的情况下，外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影子网络”来代替抵消独裁者关闭的网络。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曾经在“栅栏计划”上花费 5 千万美元，该计划用阿富汗境内美军基地信号发射塔建立了“影子网络”。显然，这类价格昂贵、耗时巨大的计划只能由准备长期占领该国的外国政府执行。

有条件伙伴关系：对于欧洲那些违反国际法或者镇压民主运动的国家，成为欧盟会员国这一有条件伙伴关系经常被用来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对斯洛伐克加入欧盟的承诺是斯洛伐克人推翻前总统梅恰尔的原因之一。加入欧盟的承诺还促使塞尔维亚人把米洛舍维奇送上了国际法庭。不过，以一有条件伙伴关系也饱受争议。批评家指出，在中东欧，这一手段在效力方面的影响被过份高估了。因为很多国家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欧盟的政策对此进程的影响十分有限。在白俄罗斯这类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有条件伙伴关系对促进民主改革的作用更微乎其微。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法、俄）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可以发起动议，谴责某个独裁、专制国家的行为（比如使用武力或者建立维和任务），或者将此案上报到国际刑事法庭。目前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安理会的决议具有一票否决权。在近期的叙利亚的案例中，某些常任理事国就成功地阻止了安理会的动议。

查明事实和联合国维和：记录人权侵害不仅可以为终结一国的暴力镇压行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还可以为起诉独裁者提供证据。查明事实是收集杀戮、强奸和其他人权侵犯证据的重要一步。这些工作可以与目击者的证词或者大规模死亡人数互相应证，进而在法庭上（比如国际刑事法庭）赢得诉讼。2011 年，洛杉矶《时代》杂志就刊载过一些西方国家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战争罪调查。为急速发展的人权监督事业建立时刻待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是另一个肩负众望的任务。

罗马法条约体系：罗马法是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体系。国际刑事法庭的刑事审判权自然适用于加入这一条约体系的国家。加入这一条约体系的国家必须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世界上让独裁者躲藏、免罪的空间越小，对于人权危害的成本就越高。

国际特别法庭：联合国安理会下属的国际刑事法庭下设特别法庭——比如国际法庭对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成立的特别法庭——无形中遏制了独裁者对其人民使用暴力。不过，这一法律机构的作用是非常有争议的。批评家指出，成立于 1993 年的南斯拉夫特别法庭在阻止斯雷布雷尼察种族大屠杀中毫无作为，也没能阻止接踵而至的科索沃战争。批评家还指出，国际特别法庭的判决只比“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宰割”正义一点点，而且很可能引发该国国民对独裁、专制政权的支持，因为独裁者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国际阴谋的受害者。比如在米洛舍维奇时代

的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就因为受到国际特别法庭起诉一度被视为国际迫害的受害者而受到国民的同情。很多民主活动家都希望米洛舍维奇能在塞尔维亚受到审判。

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庭起诉违反国际法的独裁者被视为阻止战争罪的手段。2009年，国际刑事法庭第一次对现任政府首脑发出传票。这一传票是发给苏丹总统巴沙尔的，他被指控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原本该指控还包括“种族清洗罪”，但是这项指控因为证据不足被撤消了）。不过，国际刑事法庭也极具争议，批评者认为，判决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不仅对法律的适用等等要达成国际共识，而且耗时漫长。因此，到目前为止只有非洲的独裁者曾经被国际刑事法庭定罪——这一事实招致非洲人的不满（他们认为独裁者应该在本国受审）。批评者还认为，由于国际刑事法庭没有逮捕权和引渡权，判决结果必须依靠本国政府和组织执行，这也使得起诉的效果存在问题。然而，国际行动者仍然可以施加压力，以扩大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权的范围。

国际逮捕令：外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国际逮捕令掌握司法管辖权。已经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这一方法。比如1998年西班牙以智利的人权侵犯为名，起诉智利总统奥古斯都·皮诺切特。英国当局接受西班牙法庭的要求，逮捕了当时正在伦敦治病的皮诺切特，但他最终仍然被释放，并且返回了智利。对人权侵害者发出国际逮捕令的手段如此激进，意味着只有很少的政府会做出这一选择。未来，应该有更多外国政府发出国际逮捕令。

拒绝外交豁免权：当享有外交豁免权的独裁、专制国家的高官访问外国时，被访问国家可以拒绝承认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并追究他们人权侵害的责任。这一方法对正义的实现值得我们进行广泛地探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做的国家将使自己驻该国的外交官也陷入被报复的危险。

外交制裁：是一个相对于经济和军事制裁而言，成本较低的手段。外交制裁往往是其他制裁的前奏，它包括限制或取消高等级的政府会晤、撤回外交事务、驱逐外交官。外交制裁是一个作用广泛的工具，曾经有许多被使用的案例。但它也经常被批评为华而不实，形式重于实质。

禁止出游：一个指向明确的制裁方法是禁止出游。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拒绝提供VISA，限制独裁政府特定的官员出行。偶尔，出游禁止会被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国民，比如古巴。出游禁止已经在被很多国家使用，限制名单包括利比亚、阿富汗、象牙海岸、北朝鲜、伊朗和叙利亚，这份名单没有理由到此结束，一个可以改进的方法是，可以把禁止范围扩大到掌权者的家族成员和主要支持者。

体育制裁：体育制裁是一种可以刺激公众反抗当局的制裁方法。体育制裁曾经对米洛舍维奇统治的南联盟使用。不过，对南联盟进行体育制裁的效果存在疑问。很多塞尔维亚人对于塞尔维亚足球队被排除在重大国际赛事之外感到愤怒，比如欧洲冠军杯。而这种愤怒未必总是指向米洛舍维奇，也有可能针对国际社会。这正好印证了米洛舍维奇多年的宣传——国际社会与塞尔维亚为敌。在1980年，美国和其他国家拒绝派运动员到莫斯科奥运会参加比赛，以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是另一个利用软实力发起体育制裁的案例。

武器禁运：武器禁运是指禁止出口或者销售武器给某一个目标国家。武器禁运经常用来处罚那些与别国或其本国人民发生暴力冲突的国家。比如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国际社会对南斯拉

夫实行武器禁运，以防南斯拉夫军队从境外获得武器装备。国际社会对于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也曾发起过武器禁运，作为对其入侵科威特的回应。国际社会对伊朗、苏丹、中国等国家也曾经实行过武器禁运。武器禁运一般会获得普遍支持，但是有时也会有争议。比如联合国授权对南斯拉夫发起的武器禁运，就被批评事实上在波斯尼亚战争中支持了塞尔维亚人。因为塞尔维亚人可以从南斯拉夫武器库中获得装备，而波斯尼亚人却没办法从其他地方获得武器。更近的情况是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该禁运开始于天安门事件之后——也被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批评。他们称这一禁运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军火贸易，而且加快了中国自主研发武器技术的速度。不幸的是，所有制裁，特别是武器禁运，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让黑市交易更活跃，活跃的黑市往往对独裁当局有利。

科技制裁：制裁也可以直接禁止某个特定技术的销售。对于出口到北朝鲜和伊朗的核武器技术已经被反复禁止。在未来，科技制裁还可以更广泛地适用于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各种技术上，因为互联网技术可以被用来监视或者审查国内的活动家。比如 2011 年荷兰政府宣布禁止出口互联网过滤技术给独裁、专制国家，以防这些国家使用这一技术祸害人民。在未来，西方国家可以考虑要求技术巨头，比如思科、诺基亚、西门子、耐特弗（Netfirms）这类跨国公司的某些网络技术设备出口必须申请许可证，比如那些支持“深度数据包审查”的技术。

航空制裁：为了禁止特定的人群到某国去旅行或者从某国出境，外国政府还可以发起航空制裁或者建立禁飞区。航空制裁可以禁止销售飞机或者民用飞行器的零件到指定国家。比如 2010 年，美国对伊朗执行了严厉的航空制裁，禁止波音公司销售飞机到伊朗。但这一政策在很多方面备受诟病。最普遍的指责是人民没有可靠的飞机乘坐，这会置普通旅行者于危险之中。想要了解伊朗航空制裁困境，请登录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cifamerica/2010/feb/01/iran-sanctions-us-airline>

明智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有多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出口，甚至海军封锁港口以限制进口货物等。有很多原因可以发起经济制裁，其中一个原因是保护残暴的政府统治下的国民。包括对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制裁，朝鲜战争之后对北朝鲜进行长期制裁，巴尔干战争之后对南斯拉夫进行制裁，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制裁。作为一种较温和的战争替代品，经济制裁也一样引来争议。比如在南斯拉夫，经济制裁导致灰色经济泛滥、刺激恶性通货膨胀，公众对米洛舍维奇的不满转向国际社会。但是在南非，经济制裁大力支持了反种族隔离运动，不过也有人认为对南非经济制裁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它对南非最终成功废除种族隔离可能只是起到“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使用经济制裁手段必须慎之又慎，尽可能将其指向特定的人群、公司和行业，以避免伤及一般民众。如果民众指责外国政府，而非本国独裁政府的话，经济制裁效果将适得其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制裁反而会增强独裁者在国民中的威信。

冻结资产：另一个经济制裁的方法是冻结资产。冻结资产被用来阻止独裁者，独裁、专制政权的高官，他们的家庭或者同志从海外的账户中转移或者提取资金。资产冻结经常和其他经济、政治制裁一起使用，而且一直被认为是孤立当局忠实走狗的特别有效的方法。比如瑞士冻结卡扎菲的资产。2012 年 11 月，阿拉伯联盟冻结叙利亚政府在阿拉伯国家的资产。

公司制裁：独裁者经常依赖外国公司提供的技术来镇压国内反对派。这些技术既包括军事方面，也包括互联网监控方面。2011 年 9 月，无国界记者组织解密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有多家技术跨国公司 Boeing、Cisco、Nokia、Netfirm、Blue Coat 和独裁当局存在合作关

系。该报告还指出，这些公司和中国、叙利亚、利比亚、巴林、泰国政府合作，不仅为这些政府提供对互联网进行监督和审查的通讯设备，而且还提供用户的相关数据。这份报告呼吁政府对支持独裁、专制政权者进行远程通讯监控技术的公司进行经济制裁。

条件制裁：为了鼓励独裁者改变行为，制裁可以在非常具体和可操作的条件下进行。解除制裁的许诺可以被用来奖励好的行为——因为在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下，独裁者很可能索性鱼死网破——比如美国已经开始以重大利益许诺换取缅甸释放政治犯和进行政治改革，比如向缅甸派遣美国大使。另一个可以让制裁更加灵活的方式是给叛逃者豁免权。如果变节者可以确认他们会被从制裁名单上删掉，他们可能更早的、更大规模的叛逃。

恶债：近年来，一些学者提议一种新的可以遏制其他国家借债给独裁者的经济制裁方式——恶债。恶债理论保证任何不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债务都被视为独裁者的个人债务，而非国家债务。这意味着一旦独裁者被驱逐，新成立的国家政权无需对旧统治者在位期间胡作非为欠下的债务负责。恶债制裁意味着像伊拉克这样的新的国家政权不用为萨达姆政权还债。这同时意味着外国政府和投资人在借债给独裁者时要三思而后行。关于恶债申请和其他债款制裁的详细信息，请登录 http://www.seemajayachandran.com/odious_debt.pdf

企业和消费者——如何支持非暴力运动

企业在支持独裁、专制政权方面往往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消费者也在不经意间为独裁、专制政权提供支持帮助。如果企业和消费者联合起来断绝这样的支持与帮助，那将会对独裁、专制政权造成打击。下面是一些企业和消费者在海外支持民主的方法。

不去独裁、专制国家旅游：独裁、专制国家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旅游业。在那些进行言论管制和对异见使用暴力的国家，比如斯里兰卡的海滩，埃及的金字塔，中国长城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消费者不去这些国家旅游，而是把旅游的钱花在有责任感的民主国家，可以向独裁者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喜爱美丽的风景，但我们不会对独裁、专制视而不见。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旅游抵制不只局限于独裁、专制国家本土，还可以延伸到这些国家在海外经营的某一个特定酒店或景点。还可以出版另类的“孤星”旅游指南，将这些景点列入其中。或者以这样的价值观去建立旅游中介公司。

抵制独裁、专制国家的公司：抵制是非暴力抵抗的主要方法，可以有效地孤立独裁、专制政权。抑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包括文化、金融、学术等。抵制还可以针对支持独裁、专制政府的公司，或者为独裁者的财富提供税务避风港的国家。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发起的抵制活动是成功的典范。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有效的抵制运动必须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白名单：对于与独裁者合作的公司，我们使用黑名单进行谴责，白名单则用来鼓励不与独裁者合作的公司。“国际反种族清洗”组织建立的网站“种族清洗干预冲突风险网”就列出了这样的白名单。该网站还包含了不愿投资到人权记录污点国家的机构投资者、金融服务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组织。“国际反种族清洗”组织通过鼓励和表彰对政治和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来提醒公众，哪些企业是独裁、专制国家的帮凶。

国际商务透明化：尽管独裁、专制政权拥有丰富的财政资源，但他们却常常迫使人民处于或者濒临贫困的可悲状况。“公开你的支出”组织在全世界有 8 百多个分支机构，他们的计划是要提升各国政府的财政交易透明度，以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为什么这个计划不更进一步呢？财务交易透明化应该扩展到所有与独裁、专制政权打交道的公司、政府、NGO 和个人。这种透明化不应该仅仅由法律强制来完成，更应该辅之以国际社会的监督。政府、NGO 和国际组织应该联合起来，确保经济发展不能从践踏人权中牟利。

国际视频会议：同步分享视频会议是另一种海外人士可以使用的促进活动家和国际社会交流的工具。像“通路”（Access）这样的组织已经开始使用视频会议让公司高层、政策制定者与抗议中的国内活动家直接接触。比如也门抗议者发表的演讲立即通过视频会议在美国的团体会议上进行直播。这些视频可以通过画面直接显示活动家面临的冷冰冰的威胁和人们赤裸裸的不满。视频会议不仅可以提升对独裁、专制国家人权被侵害问题的关注，也可以给那些为虎作伥的公司施加压力以改变政策。作为一个可能会产生力量的武器，视频会议需要大量且仔细的后勤准备。它们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比如活动家可能因为参与到视频中而被逮捕的时候。

企业施压：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许多企业都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为什么这些企业不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独裁者呢？企业所施加的压力完全有可能改变独裁、专制国家侵犯人权的成本与收益。如果企业可以联合起来，不与独裁者及其支持者的企业进行商业往来，那将是对世界各地独裁者的强有力的警告。

给邻国施压：邻国经常对独裁、专制国家主动支持或者听之任之。邻国会与独裁、专制国家做生意或者为独裁者提供信用担保，这一行为变相（有时候是无意的）鼓励了专制。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之所以对邻国的人权侵害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破坏地区稳定。更进一步讲，与独裁者亲近会得到回报。比如从他们奢侈的国库中抽取一部分垄断利益，以换取商品和信用。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变这种对邻国行为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方法呢？如果西方政府和公司鼓励那些独裁、专制国家的邻国停止与他们做生意，就可以孤立这些政权，提高体制内人士“弃船”逃生的概率。

附录——干涉的注意事项

上面所列举的很多方法和手段都是有争议的，而且并非适合所有情况。有些甚至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存在危险。一些方法在某些国家是毒药，在另一些国家却是良方。不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不能生搬硬套，必须适应国情。以下是海外人士在使用这些方法和手段干涉一个独裁、专制国家之前应该想到的问题。

背景

你了解那里的环境吗？

谁在做什么？

这么做触及到谁的利益？

当局的权力形态是什么样的？怎

样才能斩断权力的支柱？

同意

应当咨询谁？

你咨询过谁？

你是如何咨询的？

你是如何做出决定的？

风险和收益

在承担某种风险的情况下将有何收益？

谁会受到伤害？

当地、本国、该地区、全球对你行动的反响如何？

如何实地实现你的计划？

如何衡量、评估成功和失败的结果？

如何核查结果？

核心价值

我们的手段符合以下核心价值吗？

透明

负责

可靠

平等